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8期（民國104年6月），95-15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種公民建築的產生：晚清和民國早期中國圖書館話語與實踐*

賴德霖**

摘　要

目前中國近代圖書館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圖書館學視角的研究，它關注圖書館在書籍使用與管理方面的進步；二是建築學視角的研究，它關注圖書館建築設計、建造的歷史以及風格和技術的轉變。本文試圖整合這兩方面的研究，並將中國近代圖書館史擴展為一種社會政治和文化實踐影響下之建築類型史甚至空間史的研究。在此，本文首先討論近代以來士紳／知識分子階層以知識為手段，改革社會的努力對於中國現代圖書館話語形成與實踐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將繼續討論兩個建築學問題，即轉型過程中傳統建築以及士紳生活體驗，對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主要公共圖書館空間格局的影響；以及西方圖書館學原理影響下，中國新的公共圖書館空間對讀者與藏書關係的考量。之後，本文將以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為例，討論保存國粹的理念如何體現在該館設計上。此外，在表達士紳階層現代化理想的同時，圖書館所體現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關懷也符合政府和其他社會團體的利益，乃至西方人士文明化的願望，因而曾獲得超乎大多數其他建築類型更為廣泛的社會支持與贊助。有鑑於此，本文還將重新反思古德塞爾（Charles T. Goodsell）所定義的「公民空間」概念。

關鍵詞： 中國近代建築、圖書館運動、國立北平圖書館、公民建築、古德塞爾

---

* 收稿日期：2014年2月1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10月31日。

** 美國路易維爾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在《公民空間的社會意義：建築中的政治權威探析》（*The Social Meaning of Civic Space: Studying Political Authority Through Architecture*）一書中，作者查爾斯·古德塞爾（Charles T. Goodsell）用四個標準定義了「公民空間」（civic space）。第一是國家所有（state owned），這使它有別於私人的住宅、辦公室或汽車、商業的展廳或接待室。第二是公眾可進（accessible to the public），這使它有別於政府辦公室和會議室。第三是四面圍合（enclosed），這使它有別於公園和街道、以及市政廣場或軍隊訓練場。第四是講求規儀（ceremonial）——即在其中「人們通常要注意在他人面前的舉止」，這使它有別於政府建築中的走廊或廁所。[1]作爲一名成長於西方民主體制中的建築家，古德塞爾所理解的「國家」是一個代表著全社會多數人意志的共同體。然而這一條件是否適合任何社會頗令人存疑——如果一個國家政權並非眞正屬於人民，其本應服務於人民的機構並非眞正是爲人民服務，那麼這些機構的建築是否還可以被稱作「公民空間」？古德塞爾所討論的公民空間實例包括市政廳、法院和議會。事實上，在晚清和民國初期，中國也相繼出現這三種類型的建築。有別於宮殿、私宅，以及各種寺廟這三種最能表現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特點，即王權、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建築類型，它們被用以服務於君主立憲以及共和制的政治。但由於中國共和革命並不徹底，這些古德塞爾所關注的「公民空間」在現代中國並未持續發展，或充分實現其「公民」特質。所以討論中國的「公民空間」也很難以它們爲例證。

不過，近代以來尚有一種建築類型雖然不見於古德塞爾的討論，但仍大致符合他所提出的「公民空間」標準。它在中國得到過極爲廣泛的社會支持，體現了現代公民對於國家的理想，堪稱中國公民建築的代表。這一建築類型就是圖書館。目前中國近代圖書館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圖書館學視角的研究，它關注近代圖書館在書籍使用與管理方面的進步；二是建築學視角的研

1 Charles T. Goodsell, *The Social Meaning of Civic Space: Studying Political Authority Through Architecture*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究，它關注近代圖書館建築設計、建造的歷史以及風格和技術的轉變。本文試圖整合這兩方面的研究，並將中國近代圖書館史擴展爲一種社會政治和文化實踐影響下之建築類型史甚至空間史的研究。在此，本文首先討論近代以來中士紳／知識分子階層以知識爲手段改革社會的努力，對於中國現代圖書館話語形成與實踐的影響。其中論題有三：一、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時期社會對公共圖書館在人才教育、國粹保存及地方自治等方面重要性的認識；二、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革命對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促進；三、地方自治政治對於公共圖書館建設的推動。在此基礎上，本文將繼續討論兩個建築學問題，即轉型過程中傳統建築以及士紳生活體驗，對二十世紀早期中國一些主要公共圖書館空間格局的影響；以及西方圖書館學原理影響下，中國新的公共圖書館空間對讀者與藏書關係的考量。之後，本文將以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爲例，討論保存國粹的理念如何體現在這座圖書館設計上。此外，在表達士紳階層現代化理想的同時，圖書館所體現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關懷也符合政府和其他社會團體——無論其爲新爲舊、爲文爲武、爲政治爲經濟，或爲何種黨派——的利益，乃至西方人士文明化的願望，因而曾經獲得了超乎大多數其他建築類型更爲廣泛的社會支持與贊助。有鑑於此，本文在關注中國一種公共建築的現代化歷史的同時，還將重新反思古德塞爾的「公民空間」概念。

一、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時期社會對公共圖書館重要性的認識

中國歷代都有官府藏書，而寺觀藏書、私人藏書和書院藏書也各有發展。[2]特別至清代更爲昌盛。其中書院的藏書供院內師生使用，比官府藏書和私人藏書的服務對象廣泛，其教育性和社會性也更強。[3]然而即使如此，相對

[2] 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修訂本）》（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3] 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修訂本）》，頁 259-262。另，由兩廣總督張之洞在 1886 年創辦的廣州廣雅書院有「冠冕樓」藏書館，書籍交由兩名掌書生（圖書管理員）專門管理，

於中國的幅員和人口，這些略具公共性質的藏書樓數量依然微小。且雖然官府和私家藏書樓在保存和整理文化典籍方面功不可沒，但它們均只對少數人作有限的開放而不為公眾服務。中國現代著名出版家章錫琛曾經指出：「古代之圖書館，專務保守舊籍，而不圖增加新書以期適於用。且其書掌於衰老閒散之夫，以供一、二人之覽觀。此所謂文庫主義，未嘗有益於社會也。若近世之圖書館則不然，廣蒐適用之圖書，編纂精詳之目錄，據法分類，秩然陳列，以供社會之利用。俾書籍與讀者，得以互相結合」。[4]章氏道出了中國古代藏書樓與現代圖書館的本質區別，這就是重藏不重用。

中國傳統藏書樓步向現代圖書館的進化，與社會中一個特殊階層——士紳／知識分子——的現代化分密不可分。正如許多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所闡明的，[5]「士紳」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社會階層。雖不盡有官職，但因士紳們深受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的教化與熏陶，擁有知識和學銜，在地方上享有威望和特權，於是便可以充當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和國家行政在地方的貫徹者，甚至儒家理想的實踐者和捍衛者。士紳的這一社會角色，使他們有可能在擁有知識的同時，兼具社會關懷。

由於清朝雍、乾時期的文化高壓政策，士紳們的社會熱情曾受沉重打擊。鴉片戰爭前後，世風和士風發生明顯變化。面對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矛盾，明末清初曾經備受黃宗羲、顧炎武等學界領袖人物所提倡的「經世致用」思想——即強調學者社會關懷和學術現實意義的主張——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推崇，並成為有改革理想士人的學術目標甚至人生追求。這一轉變導致了

設立借書、還書登記制度，即是清代書院藏書樓之一例。見李次巖，〈張之洞與廣雅書院〉，《羊城晚報》，2008 年 11 月 2 日，第 B2 版。（感謝彭長歆博士提醒筆者注意這一個案）。

4 章錫琛，〈近代圖書館制度〉，《東方雜誌》，卷 9 號 5（1912 年 11 月），頁 14-15。

5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Enl. ed.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以「改變世界」爲己任的現代意義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作爲社會的良心和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他們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能充分實現。[6]

士紳／知識分子的轉變以及其改革理想和實踐，不僅催發了新的學制、新的知識體系、新的語言表達，以及知識與社會的新型關係，而且還催生了中國現代的學校建築和博覽建築，並促成中國一種建築類型的現代化，這就是傳統藏書樓步向現代圖書館的轉型。由於士紳／知識分子無論是獨善其身、修養心性，還是兼濟天下、啓蒙社會，都離不開書，他們需要依賴私家藏書、官府藏書、書院藏書，甚至寺觀藏書作爲知識來源。在一個門戶開放的時代，新知識湧入，導致出版物激增，科舉制終結又帶來知識門類擴大，新的學校、學會、學術機構都對藏書和用書提出新要求。古代藏書傳統再也不能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現代圖書館的出現乃勢之所趨。

在鴉片戰爭爆發帶來中國社會對世界的空前開放,和中國歷史的巨大變革之際，中國政治和文化界人士對於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普遍給予重視。1840年代中國近代思想界的先驅林則徐、魏源、陳逢衡、姚瑩和徐繼畬等人,在先後撰譯出版的書中，最早向國人介紹歐美各地的大圖書館、經典館和藏書樓。[7]1860 年代之後，中國改良派思想家、政論家與外交官員又親自考察歐美的一些大圖書館。[8]部份早期改良派的知識分子還在著作中表達對於圖書館社會作用和學術職能的看法。[9]1896 年，在戊戌變法醞釀之時，由梁啓超擔任總撰述的《時務報》及其後各地倡導維新變法的報刊，也都刊登許多有關新式圖

6 Antoni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s.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9), p. 331。轉引自余英時，〈新版序〉，《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1。

7 這些書包括林則徐，《四洲誌》、陳逢衡，《英吉利紀略》、姚瑩，《康輶紀行》、徐繼畬，《瀛環志略》等。

8 他們對這些圖書館的紀錄見於各自的日記，如王韜，《漫遊隨錄》、志剛，《初使泰西記》、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以及張德彝，《隨使英俄記》。

9 其中包括鄭觀應、馬建忠等。見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頁 219-220。

書館的文章。[10]可以說，在晚清的大變革時期，圖書館作爲一種特殊的建築類型獲得極大的社會關注。

中國社會關於開辦圖書館重要性的議論構成圖書館話語。這些話語與近代中國的現實密切聯繫，表達中國社會對於傳統藏書樓的重新檢討，以及對現代圖書館的社會意義，特別是在促進人才教育、保存國粹以及地方自治諸方面之作用和重要性的新認識。

（一）圖書館與人才教育

戊戌變法前後，發展公共圖書館開始被改革者們視爲一項可以遍惠士林和開通士智，甚至強國利民的舉措。如晚清教育家、學者、早期維新派人物之一的宋恕在 1891 年曾說：「日本及白種諸國莫不廣置大小圖書館，藏古今佳圖書，任民男女縱覽……故通人之多，與我國不可同年語……今宜令各縣皆置圖書小館一所或多所，購藏古今佳圖書，任縣民縱覽；京師及各商口、各名城皆置大館，其圖書任國民縱覽；則十年後，通人之多必萬倍於今日矣！」[11]1893 年改良派思想家、工商業家鄭觀應在其深具影響的《盛世危言》一書中也說：「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又反思中國指出：「泰西各國 均有藏書院、博物院……獨是中國 ，幅員廣大，人民眾多，而藏書僅此數處，何以遍惠士林？」[12]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康有爲特上書清帝，「請大開便殿，廣陳圖書」。[13]同年，他在與近代著名實業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張謇等創辦的上海強學會章程中明確表示，要「聚天下之圖書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倣古者學校之規及各家

10 參見蔣亞琳，〈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對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河南圖書館學刊》，卷 28 期 5（2008 年 10 月），頁 135-137。

11 宋恕，〈圖書章第二十九〉，《六字課齋卑議》，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47-148。

12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6、81、83。

13 康有爲，〈上清帝請開便殿，廣陳圖書書〉，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八日，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88-89。

專門之法，以廣見聞而開風氣，上以廣先聖孔子之教，下以成國家有用之才」。正是意識到「廣見聞而開風氣」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強學會章程將開「大書藏」——圖書館，與譯印圖書、刊布報紙和開博物院視爲「最要者四事」。[14]1899 年，梁啓超在《清議報》17 期上摘譯刊載〈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一文。文中指出圖書館有「八利」，即可使學校青年得輔助知識，可使不受學校教育之青年得知識，可儲藏宏富、有供學者參考，可使閱覽者隨意研究事物，可有供人頃刻間查數事物，可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可使閱覽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以及可有不知不覺養成人才。[15]再一次強調了圖書館輔助教育的功能。

以民間士紳的努力爲先導，開辦圖書館在二十世紀最初 10 年的清末新政時期發展成爲官方的改革舉措。1905 年 12 月至翌年 7 月，載澤、端方、戴鴻慈等五大臣受派遣出洋考察。雖然他們的主要使命是考察憲政，但作爲中國士紳中的上層人物，他們「知本原所在，教育爲先，故於學務一端，頗爲憚心研究」。[16]回國後向清廷呈遞了〈奏陳各國導民善法請次第舉行摺〉。這些「善法」包括圖書館、博物院、萬牲園和公園四端，皆關乎民眾智識與情趣的陶冶。其中圖書館「歐洲各國都市城鎮無不有之，雖其規模侈陋間有不同，而語以緗帙縹囊，則莫不充箱照軫。下至郵船旅社，亦復相率藏購，備客檢查……取求既便，應研考之學方多」。所以他們說：「中國以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實羞之……似圖書館之成，尚不難於速就……應懇敕學部、警部，先就京師首善之區次第籌辦，爲天下倡。妥定規劃之方、管理之法，飭各省督撫，量爲興辦，亦先就省下會繁盛處所廣開風氣，則庶幾民智日開，民生日遂，共優游於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無形

14 康有爲，〈上海強學會章程〉，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翦伯贊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頁 389-394。

15 太陽報，〈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新民社輯，《清議報全編第五集．卷二十外論彙譯．四通論》（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頁 17-21。

16 端方，〈考察學務擇要上陳疏〉，《端忠敏公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卷 6，頁 776。

之治功，實非淺鮮」。[17]

概括而言，在清末改革過程中，「嘉惠士林」、「開通民智」、「強國利民」和「增進文明」是士人們對圖書館意義與重要性的最普遍認識，也是近代圖書館話語中最響亮的聲音。

（二）圖書館與保存國粹

中國近代教育改革和國民培養的新理念，對圖書館事業的促進問題已經獲得學界廣泛重視，目前論者眾多。相對而言，保存國粹和地方自治思想的影響尚待深入探究。

按照五大臣興建圖書館的建議，清學部奏訂了《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並於宣統元年（1909）頒布。章程第一條規定「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徵博采，供人瀏覽爲宗旨」。[18]在此，「保存國粹」被視爲京師圖書館的第一使命。

《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並非「保存國粹」宗旨的發起者。此前《湖南圖書館暫定章程》已在 1906 年強調「本館以保存國粹，輸入文明，開通智識，使藏書不多及旅居未曾攜帶書籍者，得資博覽，學校教員學生得所考證爲主義」。[19]而「保存國粹」的口號則是由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最先提出。1904 年 7 月，他因「各學堂經史漢文所講太略」而設立湖北存古學堂，力圖「特設此學，以保國粹」。[20]1905 年 2 月上海國學保存會會刊《國粹學報》創刊號中又將宗旨明確爲「發明國字，保存國粹」。1905 年 11 月，河南巡撫陳夔龍、學政王垿奏請在省會設立尊經學堂，「以保

17 〈考察政治端〔方〕戴〔鴻慈〕兩大臣奏陳各國導民善法請次第舉辦摺〉，《大公報》，1906 年 12 月 8 日，第 5-6 版。

18 〈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摺〉（1910），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29。

19 〈湖南圖書館暫定章程〉（1906），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53。

20 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 184。

存國粹爲先務」。[21]翌年正月，護理湖南巡撫龐鴻書、學政支恒榮會奏將省城和衡陽府各書院分別改爲學堂，明確提出「擬仿照湖北存古學堂並參酌河南尊經學堂章程」辦理。[22]「保存國粹」的主張獲得了廣泛響應。

《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以「保存國粹」 爲宗旨應該還受到學部諮議官羅振玉（1866-1940）的影響。1908 年羅發出〈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文中呼籲：「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方今歐美、日本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尚闃然無聞焉。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畫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23]如果說張之洞和國學研究會的「國粹」概念的所指是「國 學」，對羅氏而言，「國粹」一詞則當還有古物或文物的含義。羅氏是傑出的金石學家，在他提出〈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之時，中國剛剛經歷了數起文化大發現以及大流失。如在 1907 年，被譽爲「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湖州皕宋樓 15 萬卷藏書被日本巖崎氏靜嘉堂文庫全部購買，中國學界爲之震驚。羅氏本人親眼目睹了中國文化的厄運並曾對之竭力搶救。1899 年發現記錄商代歷史的甲骨文，引發了中外骨董商和學者們爭購，散失情形嚴重。羅氏於是從 1903 年開始研究甲骨文，並於 1908 年訪求實際出土處——「殷墟」安陽小屯。1900 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1907、1908 年英、法探險家先後買走大量經卷，北京文化界、知識界爲此大譁。學者們紛紛呼籲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竊奪和購買。羅氏即是當事人之一。[24]在提議創設京師圖書館之後，他又蒐集和整理殷墟甲骨文字、考釋西陲墜簡、整理考訂漢魏石經殘石拓本，並在保存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上貢獻巨大，最終使這些珍貴的「國粹」文獻成爲

21 〈河南巡撫陳夔龍、學政王埈會奏遵旨擬設尊經學堂及師範傳習所，以保國粹而廣師資摺〉，光緒三十一年十月，收入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輯 2 下冊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 527-530。

22 〈護理湖南巡撫龐、學政支會奏改設學堂以保國粹而勵眞才摺〉，光緒三十二年正月，《東方雜誌》，卷 3 期 3（1906 年 3 月），頁 43-49。

23 程磊，〈羅振玉與京師圖書館的創建〉，《圖書館研究》，1983 年第 3 期，頁 47-49。

24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70-171。

中國現代圖書館的收藏。

在戰亂劫掠頻仍的晚清時期，保存國粹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上層文化人士來說，是比任何時期都緊迫的一項歷史使命。並非巧合，與學部頒布《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同時，民政部公布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古物保護的法規《保存古蹟推廣辦法》。1910 年學部也通飭各地「查報保存古蹟」。[25]至 1939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修正圖書館規程》，再次規定各省立圖書館下設的各部中也要包括特藏部，專門負責收藏金石、輿圖、善本和地方文獻。[26]

（三）圖書館與地方自治

除教育民眾與保存國粹之外，近代圖書館話語中還有另一項主張，就是促進地方自治；雖然不如前兩項的呼聲之高，但在當時的現實意義卻同樣重要。

1904 年湖南巡撫趙爾巽創辦中國第一所官辦公共圖書館——湖南省立圖書館。1906 年新任巡撫龐鴻書說：「圖書館之設，足以增長士民智識，實與地方進化發達，有一定之比例」。[27]對「地方進化」的關心反映當時中國政壇上「地方自治」主張。受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影響，早在戊戌變法之前，部份早期維新思想家就已提出改革中國地方制度的設想。他們主張設立地方議會，「由百姓公舉鄉官」。甲午戰爭之後，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維新人士提出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方案的同時，也把改革的希望寄託於地方政治改革。[28]新政推行後，1906 年 11 月清廷針對地方自治問題通電各省督撫、將軍，徵詢意見。由於民眾尚缺乏「自主」和「自治」意識，諸封疆大吏對於實行與否意

---

25 內政部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纂，《內政年鑑（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轉引自徐蘇斌，〈近代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史綱（1906-1936）〉，收入張復合主編，《中國近代建築研究與保護（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37。

26 《修正圖書館規程》，中華民國教育部，1939 年 7 月 22 日第 17055 號訓令。轉引自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頁 176-177。

27 〈湘撫龐鴻書奏建設圖書館摺〉（1906），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51-152。

28 姜棟，〈清末憲政改革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從清末地方自治運動談起〉，《法學家》，2006 年第 1 期，頁 129-135。

見不一，但他們普遍認識到普及教育、訓練人才和提高國民素質在此問題上的重要和迫切。如龐鴻書 1906 年在貴州巡撫任上就曾表示，要使「人人有自治思想」，就應當「首重教育」。[29]

薛玉琴、劉正偉認爲，清末義務教育的興起有多種原因，但地方自治運動的推動，是其中重要之一。[30]而正如端方所說「圖書實爲教育之母」，不難想見，作爲教育的一種補充手段，圖書館也會受到各地重視。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除江西、四川、新疆 3 省外，當時全國 18 個行省中的 15 個都建立了公共圖書館。[31]

張謇是「保存國粹」主張的積極支持者，曾經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他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地方自治運動的大力推動者，曾經廣泛宣傳「立憲基礎，首在地方自治」。[32]與很多同時代的政治家一樣，張氏也認爲「舉事必先智，啓民智必由教育」，[33]所以從 1904 年開始，陸續在家鄉南通興辦學校、公共植物園、通州五屬學務處、新育嬰堂、翰墨林書局等教育機構。1906 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出使俄國大臣胡惟德等先後奏請頒行地方自治制度後，張氏辦教育的熱忱更高。這一年設立了南通五屬學校、鐵路學校、法政講習所、中國圖書公司，還協助創辦了復旦書院。[34]1912 年他又以當地東嶽廟房屋爲館舍，創辦了南通圖書館。[35]圖書館與其他教育設施一道，成爲張氏地方自治實踐的重要組成部份。

29 廖香錢，〈清末關於地方自治的一次大討論〉，《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 8 月，頁 79-81。

30 薛玉琴、劉正偉，〈清末地方自治與近代義務教育的興起〉，《歷史教學》，2003 年第 1 期，頁 33-36。

31 傅金柱，〈晚清地方督撫與近代圖書館館建設〉，《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3 年第 3 期，頁 77-78、87。

32 張謇，〈擬組織江蘇銀行說（190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4 論說 演說》（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頁 114。

33 張謇，〈謝參觀南通者之啓事（1920）〉，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5 章程 規約 告啓 說略 賬略》，頁 198。

34 參見章開沅，《張謇傳》（北京：中華工商聯合會出版社，2000），頁 204-205。

35 張謇，〈古越藏書樓記（1904）〉，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10-111；張謇，〈南通圖書館記〉，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6 藝文雜著》，頁 446-448。

二、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革命對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促進

1910 年代中期之後，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中國的圖書館事業獲得了更大發展。新的發展被世人稱爲「現代圖書館運動」，[36]具體呈現在下列事實：與美國圖書館界的交流頻繁，進一步介紹西方公共圖書館理念，圖書館專門人才出現，現代圖書館學引入中國並進入大學課程，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有識之士大力宣傳公共圖書館重要性，以及更多公共圖書館的開辦。在圖書館話語方面，雖然圖書館學家們較少議論「保存國粹」和「地方自治」的思想，但他們在沿續晚清以來改革者們對傳統藏書樓的批判，以及以圖書館輔助教育、開通民智等理念的同時，又強調了圖書館教育功能，特別是與培養現代國民甚至移風易俗的關聯。

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受到十九世紀以來英國和美國公共圖書館運動的影響。1830 年代，伴隨著普通勞動者要求政治改革的憲章運動，英國社會呈現出全面變革的趨勢，許多新法令頒布。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要求工人輪班工作，這就使他們有了與農耕模式不同的自由時間。爲了促進社會的改良，中產階級於是呼籲，應該設法鼓勵下層民眾將餘暇用諸讀書這類有益於道德培養的活動。[37]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英國議會在 1850 年通過了《公共圖書館法》（Public Libraries Act），賦予人口在 10 萬 以上的地方郡市建造公共圖書館之權力。

在 1861 至 1865 年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部份在戰爭中致富的慈善家也開始將圖書館和其他文化事業視爲從心性上促進個人發展的手段。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於 1886 年至 1919 年期間，個人就捐獻了四千餘萬美元，在美國各地贊助興建了 1,679 座新圖書館。這些慈善家的行動呼應 1876

[36] C. B. Kwei and M. S., “Chines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Oct. 10, 1928, pp. 77-78.

[37] David McMenemy, *The Public Library*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09), pp. 24-26.

年成立之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爲促進圖書館事業專業化所做的努力。[38]

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發軔，更直接得益於美國聖公會世俗傳教士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女士的努力和倡導。韋曾任職於紐約州里士滿紀念圖書館（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1899 年探親來華，隨即在教會創辦的武昌文華學校教授英文同時兼管圖書館。「目擊平民知識淺陋，生活困苦，輒思有以救濟之……乃抉擇途徑，毅然以開通民智，提倡文化爲己任」。[39]她大力推行美國公共圖書館的辦館方式，在 1910 年創辦大眾化的公共圖書館——文華公書林（Boone College Library），服務對象兼顧文華學校師生及周圍民眾。此後她還選派並資助沈祖榮（字紹期）和胡慶生兩名中國學生赴美國學習圖書館學，並在 1920 年建立中國最早的圖書館學教育機構，即依照美國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辦學制度的武昌文華大學圖書科（Boone Library School）。[40]1923 年，韋氏專程回美，游說眾國會議員，促使美國政府批准將第二批庚子賠款退還中國，指定作爲教育與文化事業（如圖書館）之基金，另組中美庚款董事會（即後來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研究用途之支配。韋氏還代表中華教育改進社，聘請美國著名圖書館學家、曾擔任過美國圖書館協會主席的鮑士偉（Arthur E. Bostwick）博士來華講演，並調查中國圖書館事業之狀況，以期對於庚款用途有所建議。[41]1925 年鮑在全面考察中國圖書館事業之際也廣泛

38 "Government Support for Free Public Libraries: The Founding of the San Diego Free Public Library," *The History of Books*, http://historyofbooks.wordpress.com/san-diego-the-exemplar-of-the-american-free-public-library-movement/the-american-free-public-library-movement-the-san-diego-free-public-library/government-support-for-free-public-libraries-the-founding-of-the-san-diego-free-public-library/。（2014 年 2 月 7 日檢索）

39 裘開明，〈韋師棣華女士傳略〉，《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6 期 6（1931 年 6 月），頁 7-9。

40 Jing Zheng, Chuan-You Deng, Shao-Min Cheng, Wen-Ya Liu, and A-Tao Wang,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Mary Elizabeth Wood," *Library Review*, 59:5 (2010), pp. 341-349.

41 裘開明，〈韋師棣華女士傳略〉，《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6 期 6，頁 7-9。

講演，「解釋美國公共圖書館之制度及其對中國推廣公民教育之應用」，[42]最終還促成了中華圖書館協會在 1925 年 4 月 25 日成立。[43]

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興起與中國現代圖書館專門人才的出現相輔相成；他們在宣傳現代圖書館的意義並向社會普及現代圖書館知識等方面，表現得尤爲積極。1917 年沈祖榮剛留學歸國，便向報界演說宣傳圖書館事業。與晚清圖書館話語相似，他也批判了舊式藏書樓而強調了現代圖書館「開通民智」的教育功能；同時引用一位西方學者的話說：「圖書館者，國民之大學也。蓋國民不能盡入大學受課，而無不能入圖書館閱書。故國民智識之進步，與圖書館至有關係」。[44]沈氏對國民培養的重視，令人想到宋恕在評論日本及歐美國家圖書館對社會的影響時所說「其圖書任國民縱覽」。事實上，如何造就新的國民或公民，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中國也不例外。早在 1902 年梁啓超就曾在其重要著作《新民說》中批評道，歷來中國人有可以爲一個人、一家人、一鄉一族人和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决〔決〕無以自立於天壤」。[45]圖書館學家們的話是這一認識的延續，同時又反映出民國初建，社會公民意識進一步覺醒，以及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現代文化菁英們啓蒙社會和培養現代國民的理念。

1924 年中國現代著名圖書館學家杜定友（1898-1967）在《圖書館通論》一書中，對圖書館在德、智、體、美、群五方面教育國民的功能進行詳細討論：

> 凡足以輔助人生，提高生活之方法，均可謂之教育。此最近教育之定義也……觀乎入圖書館閱書者，日與世之科學家、學問家、道德家為緣，其嘉言懿行，淵奧學術，於字裡行間，皆足以感動吾人之心理，

---

42 朱家治譯，〈鮑士偉博士考察中國圖書館後之言論〉，《圖書館學季刊》，卷 1 期 1（1926 年 3 月），頁 81-86。

43 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國圖書館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頁 226。

44 〈沈紹期君在報界俱樂部演說圖書館事業〉，《東方雜誌》，卷 14 號 6（1917 年 6 月 15 日），頁 190-193。

45 梁啓超，〈新民說一〉，《新民叢報》，號 1（1902 年 2 月 8 日），頁 8-10。

> 改善吾人之行為，增長吾人之智識，提高吾人之意志及嗜好，此圖書館對於德育智育之可能也。圖書館之優雅之佈置、清靜之環境，有趣之圖書，紙上之音樂，及關係體育運動之書籍，皆足以供閱者之參考與游樂，以娛養其心身，增進其體魄，引起美感，訓練其技藝，此圖書館對於體育美育之可能也……至於合群方面，在我國尤當注意。欲養成國民合群之心理，非多設公共機關，使國民得以常相交接不可。所謂公共機關者，圖書館即其一也。試觀圖書館內之閱書者，恆靜坐於書室之一隅，受書籍及圖書館空氣之融化，每表現其禮義待人之態度，互助之精神，及愛社會愛同群之心理，積之既久，則愛國之心，油然而生。由此觀之，圖書館之於人生生活，有莫大之補助。故謂之曰教育，誰曰不宜……故今之提倡圖書館者，其宗旨一以保存我國固有之文化，一以灌輸歐美新文明，使學術界多一參考地，國民多一休養所，此則吾人所應自謀者也。[46]

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勃興恰逢國民革命高潮，[47]杜定友以「國民」爲服務和教育的對象，並希望通過圖書館「養成國民合群之心理」呼應此一特定時期民族主義的浪潮。而意識形態的影響,同樣體現在另一位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李小緣（1897-1959）的著述中。李氏在 1927 年所擬的〈全國圖書館計劃書〉中提出口號：「流通有用的書籍及關於革命的書籍！」「圖書館是貫澈〔徹〕普及革命精神唯一的工具！」「借閱圖書是公民的權利，歸還圖書和愛護圖書是公民的義務」。[48]

毫無疑問,圖書館對讀者智識的影響首先在於它的藏書。不過，正如杜定友已經注意到，圖書館文明的環境和建築空間對於讀者養成公民意識和現代作風同樣十分重要。與當時中國大多數公眾可以自由進出的公共空間，如寺觀、

46 杜定友，《圖書館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 3-20。

47 如 1924 年 1 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 1 月至 8 月，孫中山又在廣州先後作了 16 次關於新三民主義的講演。

48 李小緣，〈全國圖書館計劃書〉，《圖書館學季刊》，卷 2 期 2（1928 年 3 月），頁 209-234。

戲園、餐館、澡堂，甚至公園都不同，現代圖書館建築空間，特別是閱覽室，對於讀者的言行有著特殊的要求，也即古德塞爾在定義公民空間時所說的「講求規儀」。如中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古越藏書樓的《閱書規程》曾規定「閱書者各宜自重，不得在座中隨意談譃……此地專爲藏書及閱書而設，一切人等不得於此中宴會、賭博、歌唱，以昭鄭重」。[49]1923 年《申報》發表的〈圖書館內應遵守之規則〉一文更爲具體，它規定：

> 1、入閱書室或閱報室時宜輕步，不可妄言嬉笑，妨礙他人視聽，出時亦如之。2、取書報時，宜依次順取，不可紊亂。3、不可割裁圖書或報紙上片紙隻字。4、書報上不可任意亂塗。5、如己所欲閱之書報，適值他人正在閱看，則當靜待他人閱畢後，然後取閱，不可逗遛他人左右，致為所厭。6、書報宜一一取之不可多取。7、如見有書報落在地上，則當代為拾起。8、室內座位不可任意移動。9、書報閱覽畢後，宜放置原處，不可隨意拋棄。10、館中書報當愛護之，一如己物。11、館內書報不可擅自攜出。12、宜注意衛生，不可隨地吐痰。[50]

美國圖書館史學者艾碧格爾．凡．斯萊克（Abigail Van Slyck）在研究卡內基圖書館時指出，這些早期圖書館的室內設計都意在鼓勵中產階級所欣賞的行爲模式。無論是爲兒童還是成人服務，閱覽室的桌子都是整齊排列，給讀者一種秩序感。而兒童閱覽室往往還有洗手池，供小讀者盥洗。兒童閱覽室又多與成人閱覽室相通，使兒童受到成人監督，因此強化了兒童舉止的成人化。凡．斯萊克因此認爲，與其說這些圖書館是閱覽（read）的場所，不如說是學習（learn），即接受中產階級行爲方式訓練的場所。[51]中國圖書館中的這些規定，則是對讀者基本公德和文明行爲的「規訓」（discipline），目的就在於培養自覺、自律和富有社會責任感的現代國民。

---

[49] 〈古越藏書樓章程〉，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17。

[50] Z. D.，〈常識．道德．圖書館內應遵守之規則〉，《申報》，1923 年 11 月 13 日，常識第 1 版。

[51] Abigail A. Van Slyck, *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 American Culture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109, 178.

除了通過書籍和圖書館空間教育和規訓民眾之外，還 有人試圖以圖書館建設作爲一種豐富民眾精神生活，甚至移風易俗的手段。如杜定友曾說：「圖書館對於市民之修養，爲一決不可少之輔助機關，吾人欲求一理想中完美的社會生活，則非有圖書館之設立不可，近日中國社會之風氣，已至於惡極地步，有心改造社會者，對於精神上物質上，亟當注意於此」。[52]1925 年另一篇《申報》文章更有針對性地說：「我國國民嗜好多卑鄙，投情樗蒲者有之，肆志青樓者有之，金錢喪失，人格破產，莫之顧也……其主要原因，則彼等缺乏正當的娛樂是也……今欲使彼等免於罪戾，對症下藥，首在創設圖書館與公園，使之消遣有所。前者陳列各書，任人觀覽，宜多藏常識豐富之作、活潑有趣之文、佳言懿行之書，所以益民智、怡民情、厚民德也」。[53]

移風易俗還表現在改革傳統禮俗。早在 1920 年，蘇州顏料商人奚萼銘之子曾捐款 5 萬元建圖書館，並擬爲奚氏鑄銅像於館中，「以留紀念」。[54]這或是中國人以開辦圖書館的方式表達紀念情思之首例。1926 年另一位《申報》讀者又提議「移祝壽費用建築圖書館」，「一方報答親恩，一方嘉惠學界」。[55]南京市長劉紀文也在移風易俗方面做出了示範。1928 年 10 月他與許淑珍新婚，正値南京市政府參事陳公哲與各局局長商議建築市立圖書館事宜，劉隨即要求「凡各界賀儀，一律撥作建築藏書樓之需」。[56]

張謇在 1918 年後所寫〈南通圖書館記〉一文中曾回憶說：「言革命者，本泰西科學家言，破迷信，斥鬼神。民國元年，里少年議盡毀諸神祠。謇於是謀諸兄謀耆老，特留祀典州縣長官應禮祀之神，而汰別僭濫，改〔溫元〕帥廟爲醫校，因〔東〕嶽廟爲圖書館」。[57]1928 年後，伴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各

---

52 杜定友，《圖書館與市民教育》（廣州：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1922），頁 7-8。

53 仲穎，〈常識．市政．地方自治亟應舉辦的兩大事業（圖書館與公園）〉，《申報》，1925 年 4 月 2 日，第 12 版。

54 〈地方通信．蘇州．捐款建圖書館〉，《申報》，1920 年 6 月 14 日，第 7 版。

55 周國春，〈禮俗．移祝壽費用建築圖書館〉，《申報》，1926 年 2 月 24 日，第 17 版。

56 〈首都紀聞．南京〉，《申報》，1928 年 10 月 10 日，第 7 版；〈京市籌建圖書館〉，《申報》，1928 年 12 月 5 日，第 6 版。

57 張謇，〈南通圖書館記〉，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 6 藝文

地普遍興起破除迷信、搗毀偶像的運動。又有更多舊廟宇被改用爲新的公共建築，其中也包括圖書館。[58]凡此種種，反映出在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裡，新社會力量對於舊有公共領域和空間的爭奪和再利用。

簡言之，中國現代圖書館學家和社會有識之士，認知到國民或公民教育以及圖書館對於改造社會之重要性，進一步豐富了近代以來圖書館在人才教育方面的意義的話語。它受到了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革命的雙重影響，同時通過普及以圖書館爲手段教育國民和改造社會的思想，現代圖書館運動又配合了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革命。

民國建立後，北洋政府繼續促進圖書館建設，並區分出兩種公共圖書館經辦方式，即不收閱覽費和得附設公眾體操場的「通俗圖書館」，以及得酌收閱覽費的「圖書館」。1915 年 10 月和 11 月教育部頒布了《通俗圖書館規程》及《圖書館規程》，[59]顯示出國家通過法律手段對圖書館事業的大力提倡和鼓勵。其後的 20 年間，中國的圖書館事業長足有進，在各地區的數量大大增加之際，還在整體上呈現出按知識階層高低普及至社會的趨勢。據統計，民國初年全國圖書館有二十餘所（不包括大學圖書館）。[60]而據北洋政府教育部調查，1916 年全國有省立圖書館 23 所，通俗圖書館 237 所。此外，各地還有巡行文庫 30 處、公眾閱報所 1,708 處。[61]報紙不僅可以向民眾普及知識和向業者傳播市場信息，更能爲社會提供廣泛的國內外時事要聞。本・安德森（Benedict

雜著》，頁 446-447。

58 參見〈寶山縣廢城隍廟改歸民眾公用：改爲通俗教育館、通俗圖書館、民眾娛樂院、民眾大禮堂〉，《申報》，1929 年 6 月 16 日，第 15 版；〈本埠新聞二．文廟公園圖書館啓放有期〉，《申報》，1932 年 1 月 16 日，第 15 版。

59 《通俗圖書館規程（1915 年 10 月）》、《圖書館規程（1915 年 11 月）》，錄自《教育公報》，期 8（1915），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84-186。

60 《中國近六十年來圖書館事業大事記》，轉引自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修訂版）》，頁 360-361。

61 教育部調查，〈各省圖書館一覽表（1916）〉、〈各省通俗圖書館調查表（1916）〉、〈巡行文庫（1916）〉、〈公眾閱報所（1916）〉，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252-261。

Anderson）因此認爲報紙有助於促成彼此陌生的人在時空上的一體化和對於一個共同的社群的想像，而這種想像就是現代國家的標識。[62]毫無疑問，民國後在中國城市中普及的公共閱報處和公共圖書館的報紙閱覽室，同樣產生促進新的國族認同作用。

三、地方自治對於作為地方公益事業之圖書館建設的推動

圖書館與其他城市公共空間的建設還能有助於市民身心健康、輔助地方教育，主張以圖書館建設作爲一種移風易俗手段者認爲，圖書館和公園「實地方教育之中心，辦理地方自治者，其速建之」。[63]不可否認，地方自治還直接取決於地方公民團體對地方事業的參與熱情。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不僅需要圖書館界人士努力，還需要國家、地方甚至民間的大力支持。

如同戊戌變法時期，在 1927 年國民政府成立、中國重新進入由國家主持全面建設階段前，民間力量的支持曾是圖書館事業發展最主要的推動力。[64]1926 年創刊、1937 年停刊的《圖書館學季刊》先後介紹過中國 24 所著名的公私立圖書館，其中由中國人個人捐建的有 3 所，即南京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天津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以及山西太谷銘賢學校亭蘭圖書館（基泰工程司，1935-1936）。孟芳圖書館的捐建者是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齊燮元之父齊茂林（字孟芳）。另兩位捐建者一是盧靖（號木齋），著名教育家、藏

---

6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p. 35-36.

63 仲穎，〈常識．市政．地方自治亟應舉辦的兩大事業（圖書館與公園）〉，《申報》，1925 年 4 月 2 日，第 12 版。

64 如《申報》就曾報導〈皖紳倡設圖書館〉（1919 年 5 月 19 日，第 7 版）、〈南京法政大學向各界募捐建設圖書館〉（1924 年 3 月 4 日，第 11 版）、〈復旦〔大學師生〕募捐建築圖書館〉（1924 年 3 月 16 日，第 26 版）、〈滬總商會商業圖書館收到外界捐贈圖書甚多〉（1924 年 3 月 30 日，第 13 版），以及〈蘇州圖書館召開發起人會議討論籌集捐款事〉（1924 年 4 月 10 日，第 10 版）。

書家、刻書家和實業家，曾擔任保定大學堂督學、直隸提學使、奉天提學使和東北三省提學使。一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銘賢學校校長孔祥熙（亭蘭圖書館即爲紀念其父母孔和亭和龐玉蘭）。三位贊助人的行爲是「明道救世」士人傳統的延續，並體現出他們個人對於培養地方人才的積極性。據《孟芳圖書館落成紀念冊》，包括黎元洪、王寵惠、周學熙、馮玉祥、盧永祥在內的 38 位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界人士，以及北京的銀行公會均爲這所圖書館捐助了圖書購置費；另有包括梁啓超、唐文治、向達、蔣維喬、錢基博等著名學者，以及吳佩孚、朱啓鈐、顧維鈞、穆藕初等政要和工商界名流在內，總數超過 66 位的個人、3 所圖書館，還有法國外交部及蘇爾、文德、李哥白等顯係外籍的個人亦捐助了圖書；充分顯示出這些職業、政見甚至國籍並非相同的人士或團體對圖書館事業的一致認同。雖然這些支持也有賴於齊燮元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個人的影響力，但毫無疑問，這種影響力的基礎還是各方人士對於地方文教事業的熱情和貢獻。

最能體現地方公眾對圖書館事業的支持和參與的城市是上海——中華圖書館協會的誕生地。上海的現代圖書館事業最初由在滬西人機構發起；清末新政又有許多華人團體或個人投身其中，在 1936 年上海市政府開辦市立圖書館之前，擔當了地方圖書館事業最主要的贊助人，表現出知識界個人和公民團體對地方公益事業的熱情關注和積極支持，具示範性地實踐鮑士偉提出的「公共的支持」、「面向兒童」、「帶有分館」等現代圖書館理念。（表 1）

表 1　近代上海由華人贊助興辦的重要公共圖書館略表

圖書館名稱	創辦時間	創辦人或機構
國學保存會藏書樓	1906	鄧實、黃節、劉光漢
滬江大學圖書館	1908	滬江大學
涵芬樓	1909	出版家張元濟
東吳大學法學院圖書館	1915	東吳大學
中華書局圖書館	1916	中華書局
中華學藝社圖書館	1920	中華學藝社
上海通信圖書館	1921	沈濱掌、應修人等
大同大學圖書館	1921	大同大學
復旦大學圖書館	1922	復旦大學
總商會商業圖書館	1922	上海總商會
少年宣講團兒童圖書館	1922	少年宣講團
世界語圖書館	1923	陳兆瑛
持志學院圖書館	1924	持志學院
東方圖書館	1924	商務印書館
上海醫藥圖書館	1924	林濟蒼、陳存仁
圖書館學圖書館	1925	上海圖書館協會、國民大學圖書館學系
鴻英圖書館	1925	實業家葉鴻英
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圖書館	1926	光華大學、大夏大學
暨南大學圖書館	1927	暨南大學
震旦大學圖書館	1928	震旦大學
東方圖書館附設兒童圖書館	1928	東方圖書館
民眾圖書館（五所）	1928	上海市教育局
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	1930	中國科學社
工部局公眾圖書館兒童部	1932	公共租界工部局
上海市兒童幸福委員會圖書館	1934	上海市兒童幸福委員會
蟻蜂戲劇圖書館	1935	
上海市圖書館	1931-1936	上海市政府

資料來源：胡道靜，〈上海圖書館史〉，《上海通志館期刊》，年2期4（1935年3月），頁1355-1477；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修訂本）》（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頁274-290；〈上海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建築創作》雜誌社編，《百年建築——天人合一、館人合一》（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5），頁60-85。

鮑士偉視「公眾的支持」爲現代圖書館的首要標誌，[65]這一點明顯地體現在上海圖書館事業發展過程中。儘管在 1920 年代以前上海的公共圖書館事業已經領先中國其他各城市，但當地人士並未滿足。1921 年 3 月 4 日《申報》「公民常識」專欄曹樂澄發表了一篇題爲〈上海的一個大缺點——圖書館的缺少和今後之需要〉的文章；針對上海的圖書館少、小和不完善的現狀，作者倡議說：「現在我有兩個辦法，且設在下面。（一）由私人從事設立……（二）由地方人士募集大宗經費，從事大規模的設立。好在這種事件，乃是公益之事，地方人士，必能樂於輸助的」。[66]

曹的批評和倡議並不孤立。1922 年 4 月 11 日英、美在上海的文化機構廣學會和亞洲文會聯名致函上海總商會，敦請華商巨子、熱心興學者協力籌措，共同創設一所中國的公共圖書館。事實上總商會早在 1920 年就設置了「圖書室委員會」，著手籌建公共圖書館，以作爲自身的新事業之一。委員都是上海當地的工商業名流，如德大與厚生紗廠總經理穆藕初、房地產業兼營工業與銀行的徐冠南、上海商報經理湯節之、商務印書館董事高翰卿和發行所所長王僊華以及中華書局總經理陸伯鴻等。收信後，總商會便聯絡江蘇省教育會和上海縣教育會，商議「如何與地方人士切實籌劃，於華界內自行設一規模完整之圖書館，藉以嘉惠後學，并表示滬人建設能力之處」。短短兩個半月之後，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就正式開館，[67]極佳地顯示了「滬人建設能力」。

65 1910 年鮑在其《美國公共圖書館》（*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一書中概括了現代圖書館的基本特點，即「公眾的支持」（public support）、「開放的書架」（open shelves）、「面向兒童」（work with children）、「與學校的配合」（cooperation with schools），「帶有分館（branch libraries）」和「流動圖書館（traveling libraries）」，以及「圖書館的對外推廣和宣傳（library advertising）」。Arthur E. Bostwick,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New York & London: D. Appleton & Co., 1910), pp. 8-9。（表示爲劉氏可能見到的版本）又：中國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將近代圖書館之特徵概括爲「公立、自由閱覽、自由出入書庫、兒童閱覽部之特設、與學校協作、支部與巡回圖書館之設立、科學的管理、推廣之運動」八項，顯然受到了鮑著的影響。劉國鈞，〈近代圖書館之性質及功用〉，《金陵光》，卷 12 期 2（1921）；轉引自劉國鈞著，史永元、張樹華編輯，《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頁 2。

66 曹樂澄，〈公民常識．上海的一個大缺點——圖書館的缺少和今後之需要〉，《申報》，1921 年 3 月 4 日，第 17 版。

67 〈倡設公共圖書館之商榷〉，《申報》，1922 年 4 月 14 日，第 13 版；〈總商會商業圖書館今

1920 年代上海最著名和影響最大的圖書館無疑是東方圖書館，其興建和開放是私人努力和團體配合的結果。這所圖書館的前身「涵芬樓」原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藏書樓，1909 年由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創建，用以收藏地方誌和購自從江南多家私人藏書樓先後散出的藏書。1924 年商務印書館同仁決定開放樓中二十餘萬冊藏書，供社會公眾閱覽，同時改名「東方圖書館」。[68]

東方圖書館在上海市乃至國家的圖書館事業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正如時人所說，「兒童爲未來之大國民，亦爲國家所最有希望之國民」，而上海兒童圖書館「尤形罕見」，[69]經董事兼館長王雲五的擘畫，東方圖書館在 1928 年 3 月成立附設兒童圖書館。1928 年 4 月，上海市教育局以「圖書館爲灌輸文化及增進智識之機關，不可不加以整頓及擴充」，擬將原設 5 所民眾圖書館改組爲一所大型通俗圖書館，[70]王又受命「規劃一切」。[71]同年 5 月，在民國政府大學院召開的全國教育會上，王「鑑於國內各學校圖書館尚未普遍設立，圖書經費尤形竭蹶，而國府首都尚未建設大規模之國立圖書館以爲國內各圖書館之表率」，又提出〈請大學院通令全國各學校均須設置圖書館，並於每年全校經常費中提出百分之五以上爲購書費案〉，同時提議〈請大學院從速設立中央圖書館，並以該館負指導全國圖書館之責任案〉。[72]

一份 1930 年代初的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各地圖書館事業發展並不平衡，表現出沿海多於內陸，華北多於西北，華南多於西南。（表 2）這一結果與各地在國內經濟、文化和政治中的地位大致相同。如果說公立圖書館的數量可以反應出各地政府對圖書館事業的重視程度，各地私立圖書館的

日開放〉，《申報》，1925 年 1 月 29 日，第 8 版；曹華霞，〈述上海總商會商業圖書館〉，《申報》，1925 年 10 月 28 日，本埠增刊第 1 版；夏東元主編，《二十世紀上海大博覽》（上海：文匯出版社，1995），頁 272。

68 東方圖書館編，《東方圖書館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頁 1-4 。

69 畢卓君，〈東方之產兒——兒童圖書館一瞥〉，《申報》，1928 年 3 月 21 日，本埠新聞第 1 版。

70 〈市教育局擴充圖書館計劃——整理民眾圖書館、籌設通俗圖書館〉，《申報》，1928 年 5 月 10 日，本部新聞第 1 版。

71 〈市教育局將組通俗圖書館〉，《申報》，1928 年 4 月 18 日，第 11 版。

72 〈王雲五之提案〉，《申報》，1928 年 5 月 9 日，第 12 版。

多寡則反射出個人或民間團體對地方文化事業的參與熱情。上海 148 所圖書館中私立與公立的比例超過 3：1，表明當地公民團體的活躍和發達。

表 2　1935 年全國各類圖書館分省統計

省 / 市	公立圖書館	私立圖書館	合計
上海	34	114	148
北平	36	43	79
南京	38	14	52
青島	8	1	9
廣東	215	92	307
江蘇	166	47	213
浙江	164	49	213
河南	179	13	192
山東	153	5	158
河北	131	11	142
四川	105	32	137
湖南	89	17	106
山西	85	9	94
福建	69	23	92
雲南	84	1	85
湖北	66	15	81
陝西	72	2	74
安徽	59	12	71
廣西	69	0	69
江西	45	9	54
貴州	47	5	52
甘肅	49	1	50
綏遠	17	0	17
察哈爾	10	0	10
青海	7	0	7
寧夏	4	0	4
西康	4	0	4
全國共計	2,005	515	2,520

資料來源：許晚成編，《全國圖書館調查錄》（上海：龍文書店，1935），頁1。

地方自治思想還表現在有關藏書的考量。如 1920 年代初，曾有學者呼籲圖書館的圖書擴充須注意於地方需要及閱覽者之性質，如在城市，則應多備工商市政書籍；如在鄉村，則應多備農林鄉治書籍。[73]此外，各地方圖書館無不重視各省地方文獻之蒐集、整理及刊印，有效地促進了區域社會史及方誌學之研究。[74]

在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促進和新的公民團體及諸多有識之士們的推動之下，中國的圖書館建設有了極大的發展。據中華圖書館協會的統計，1925 年時全國各類圖書館共 502 所，其中公共圖書館 259 所、學校圖書館 171 所、72 所機關、團體及其他類型圖書館。[75]而至 1934 年 12 月，中國已有 2,818 所圖書館，其中國立 2 所、省立 27 所、904 所縣立、市立、私立和兒童圖書館共、教育館 1,002 所、大中小學校圖書館 497 所，377 所屬於專門學校、政府機關和文化團體的專門圖書館，還有特種圖書館 9 所。[76]這一情形表明，至 1930 年代，在中國一個多地區、多渠道和多層次的圖書館開辦局面已形成。

四、轉型過程中傳統建築以及士紳生活體驗對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公共圖書館的影響

戊戌變法前後，興辦公共圖書館不僅是中國士人們的呼聲，也是部份提倡改革的個人和團體之行動。至清末新政時期，各地政府也紛紛加入這項象徵著現代化的公益事業。世紀之交中國出現了近代史上第一次興辦現代圖書館的熱潮。不過或許由於此時中國尚缺少受過現代圖書館學教育的圖書館專家，也缺少受過現代建築學教育的建築師，多數地區大量的工程營建還延續著傳統的體制和方式，而清末的經濟狀況也迫使許多地方利用學宮、廟宇等

73 壽毅成，〈小圖書館與大文化運動〉，《東方雜誌》，卷 18 期 2（1921 年 1 月），頁 118-119 。
74 左玉河，〈從藏書樓到圖書館：中國近代圖書館制度之建立〉，《史林》，2007 年第 4 期，頁 24-39。
75 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修訂本）》，頁 348。
76 中華圖書館協會編，《全國圖書館及民眾教育館調查表》（上海：中華圖書館協會，1935），封底內頁。

官產因陋就簡，所以這一轉型時期的中國圖書館在建築形制上不免受到傳統建造方式的影響。雖「間有少數爲熱心公益者所建築」，但以現代圖書館的標準衡量，依然「鮮適實用者」。[77]

目前學界一般公認，由國人創辦、對公眾開放、第一所具有近代公共圖書館特徵的藏書樓是紹興古越藏書樓。該藏書樓由浙江舉人、曾授兵部郎中改知府的藏書家徐樹蘭（1837-1902）捐資，1903 年告成，次年開放。徐氏曾撰文表明他效法西方國家和日本而捐建藏書樓以嘉惠士林的願望：

> 竊維國勢之強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視學識之博陋……泰西各國講求教育，輒以藏書樓與學堂相輔而行。都會之地，學校既多，又必建樓藏書，資人觀覽……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以舊幕府之紅葉山文庫、昌平學文庫初移為淺草文庫，後集諸藩學校書，網羅內外物品，皆移之上野公園，稱圖書館，聽任眾庶觀覽。其餘官私書籍館亦數十處，藏書皆數十萬卷。一時文學蒸蒸日上，國勢日强，良有以也……當此科舉更章之際，講求實學，每苦無書。職不揣棉薄，謹捐銀八千六百餘兩，於郡城西偏購地一畝六分，鳩工營造，名曰古越藏書樓，以為藏書之所。[78]

古越藏書樓建築已毀，今天僅存臨街的首進石庫門門樓。據徐氏本人描述，原建築前後共四進，前三進爲樓房，用以藏書，第二進的中廳是公共閱覽室，設 60 座，備讀者閱覽。這一描述顯示，這所中國轉型時期的藏書樓在設計上延續了江南廳堂建築的格局，並沒有採用現代圖書館的結構和設備。

在清廷的提倡和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創辦新式圖書館成爲晚清各地政府現代化事業的一項重要內容。1904 年中國第一所官辦公共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建立。繼湖南之後，許多總督或巡撫等大吏要員在新政時期也紛

77 朱家治譯，〈鮑士偉博士考察中國圖書館後之言論〉，《圖書館學季刊》，卷 1 期 1（1926 年 3 月），頁 81-86。

78 徐樹蘭，〈爲捐建紹郡古越藏書樓懇請奏咨立案文（附〈古越藏書樓章程〉）〉（1904），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12-118。

紛奏請設立圖書館。[79]據不完全統計，至 1911 年全國公私立新型圖書館已有 26 所。[80]

福建圖書館（1906）、江南圖書館（1907）、雲南圖書館（1909）和廣東圖書館（1909）等官辦公共圖書館，是在原有傳統書院的基礎上改建而成。[81]其中江南圖書館實物、圖紙和圖片材料至今保存較多。1907 年江南藏書家丁丙欲售其「八千卷樓」藏書，時任兩江總督端方奏請政府全部收購，並在南京龍蟠里原清道光年間兩江總督陶澍所立惜陰書舍的舊址，成立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前身）予以收藏，1910 年對外開放。[82]圖書館建築群由四排院落組成，其中左右兩排各三進，中間兩排各四進。（附圖 1）大門爲門堂、傳達室和售劵處以及警士室，門內沿軸線第一座廳堂保留了原書院的禮殿，即用於祭祀陶澍和晉陶淵明的禮儀空間「景陶堂」〔民國後堂名依舊，也表示對創辦人端方（號匋齋／陶齋）的紀念〕（附圖 2），其後和其右諸廳——當爲原書院的講堂部份——分別改爲普通閱覽室和善本閱覽室。景陶堂廂房改爲館役室等辦公和服務用房。左側院落原缽山精舍改爲日報室。後院兩座樓名「陶風樓」，爲 1908 年新建的藏書樓。前樓樓下爲館長、主任、掌書員等辦公室，樓上則用爲普通書庫，後樓樓下爲普通書庫和檔案庫，樓上爲善本書庫。[83]

山東省圖書館（附設金石保存所）之設計則結合傳統園林的布局。（附圖 3、4）該館由巡撫袁樹勳在宣統元年正月奏建，同年十二月落成。館址選在濟南城東學堂東偏貢院隙地，名爲「暇園」。其中假山起伏，曲水環繞，花木扶疏，橋榭相接，另有「海嶽樓」（藏書樓）、「宏雅閣」（上儲藏古物與教育

79 倪怡中、陳銀龍，〈張謇與晚清民初公共圖書館的興起〉，《江海縱橫》，2013 年第 5 期，頁 44-47。

80 周紅，〈教育救國思想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5 年第 5 期，頁 98-99、104。

81 〈直隸總督陳夔龍奏前署提學使盧靖捐建圖書館請奬摺〉等；呂紹虞，〈中國圖書館大事記（1908-1919）〉，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42-168、385-387；杜定友編，《廣東文化論叢》（廣州：廣東省立圖書館，1949）。

82 〈江蘇省立圖書館沿革（1907-1919）〉，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294-301。

83 柳詒徵，《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南京：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8）。

用品，下爲檢發圖書處、接待室和抄書室）、「讀書堂」（閱書室）、「明漪舫」（兒童閱覽室）、「博藝室」（文物字畫）、「漢畫堂」、「羅泉堂」（歷代貨幣）、「虹月軒」（事務室）、「提要鉤元之室」（員工住房）等建築，此外還有「金絲榭」、「浩然亭」、「蒼碧亭」、「鴻橋」、「漲渌洪」、「朝爽臺」、「綠雲居」、「牡丹臺」等景點。[84]雖然這座圖書館建築的設計人尚待查考，但園林式布局和建築及景點的命名，都顯示出受傳統教育士紳的參與甚至主導。

無論採用住宅格局、書院格局還是園林格局，上述實例都顯示出傳統建築以及士紳生活體驗對於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公共圖書館的影響。

五、西方圖書館學原理影響下中國新公共圖書館空間對讀者與藏書關係的考量

中國近代以來的新式圖書館，有許多是依普通的公共場所或民房改建而成。即使是那些專用館舍，包括上海東方圖書館等著名者，其建築也不盡合乎圖書館建築原理。[85]圖書館專門人才的出現，促進中國新式圖書館按照西方現代標準設計和建造。除了採用了有利於防火、防潮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並呈現出象徵著西方文明或體現著中國傳統的造型之外，這些圖書館最重要的特點是具有符合現代圖書館功能要求的布局。

中國建築的現代化體現在制度、技術、教育，以及造型和美學思想等諸多方面，西式建築類型的激增和它們取代許多中國傳統建築類型也是其中之一。這一變化是伴隨著西化和現代化，新的專業或職業產生，以及傳統的職業在經營或管理方式發生改變所導致。社會分工變細、各職能部門專門化加強、聯絡方式趨於複雜，必然導致各種專門學科或職業重新系統化或體制

84 〈山東省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建築創作》雜誌社編，《百年建築——天人合一、館人合一》（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5），頁 126-147。

85 參見胡道靜，〈上海圖書館史〉，《上海市通志館期刊》，年 2 期 4（1935 年 3 月），頁 1440。

化。新建築類型的出現，就是這些變化在建築空間上的表現。新的系統化和體制化，同樣體現在傳統藏書樓步向現代圖書館的轉變之中。相對於功能和管理方式較爲單一的傳統藏書樓，一所現代圖書館就是以館長爲領導，下轄出納、參考、幼童、目錄編輯、展覽，以及庶務等多個職能部門的一個專門性公共文化機構。[86]

也正是在現代圖書館運動中，中國媒體出現有關現代圖書館設計原理的介紹。其中最早的或是 1916 年《教育公報》上發表的譯文〈學校文庫及簡易圖書館經營法〉。文並附平面圖介紹規模爲 1 室至 3 室小型圖書館的布置方式；其核心即置出納所於門口或書庫與閱覽室之間以便管理。[87]而視圖書館建築爲「社會文化進步之徵象」[88]的杜定友本人也曾翻譯有關圖書館建築設計要求的著作，即 1927 年 5 月《東方雜誌》發表的〈科學的圖書館建築法〉一文。[89]作者將圖書館空間分爲「藏書的地位」、「閱者的地位」和「館員的地位」——即書籍與閱者的中介——三種基本要素，以及圖書室、演講廳、集會室、裝訂室等附屬要素。「藏書的地位」即書庫，「閱者的地位」即閱覽室、卡片目錄和出納處，而「館員的地位」則包括館書（長）室及總務室、編目室和製卡室、登記室和分館室、裝訂室和印刷室、貯藏室、膳室和退息室以及雜役室等。處理讀者與書籍的關係是圖書館空間布局設計的關鍵，正如作者所說：「無非是要求書籍和讀者聯絡起來」。

如何「聯絡」書籍和讀者？杜定友介紹了三種方式，即凹室制（Alcove System）、開架制（Open Shelf System）和書庫制（Stack System）。前二者都允許讀者自由取閱，也即廣義的開架，而後者則是將書藏於與閱覽室結構

86 〈沈紹期君在報界俱樂部演說圖書館事業〉，《東方雜誌》，卷 14 號 6（1917 年 6 月 15 日），頁 190-193。

87 〔日〕金澤慈海著，李明澈譯，〈學校文庫及簡易圖書館經營法〉，《教育公報》，期 4（1916 年），頁 10-17。

88 杜定友，《圖書館與市民教育》，頁 4-5。

89 杜定友譯，〈科學的圖書館建築法〉〔譯自 The Snead & Co. Iron Works, *Library Planning, Bookstacks and Shelving*, (New Jersey: The Snead & Company Iron Works, 1915) pp. 108-117〉，《東方雜誌》，卷 24 號 9（1927 年 5 月 10 日），頁 61-70。

完全不同的書庫之中，通過出納檯借給讀者，亦即閉架。圖書館學家龍永信已經指出，雖然開架閱覽對讀者無疑最爲方便，還可以刺激並鼓勵求知，但它的若干弊端使它難以在當時的中國得到普及，這就是書籍易遭亂置、易受破損、易遭失落，因此會增加管理經費，而且需要較大空間。[90]其中如何使藏書空間能夠適應不斷增加的藏書量，是任何圖書館都會遇到的問題。1876年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率先採用書庫制，將書籍以鋼質書架，壓縮性的藏於通道細窄和層高低矮的專門書庫。此後，這一方式就被視爲現代圖書館的最重要的革新而得到廣泛採用。[91]而儘管開架制也是許多中國學者相信的理想方式，它易招致的圖書損失卻一直令圖書館人士們心存顧慮，[92]所以不難理解，近代大多數中國圖書館採用的都是書庫制（閉架制）。

雖然存在種種擔心和懷疑，韋棣華依然堅持開架方式：「不可以小人行爲，蔑視士類；縱有借去未歸，不妨勸勉告誡，使之清出送還 ，以養成其愛惜公物之美德」。[93]由她在 1910 年親自募捐創建的武昌文華公書林，就是近代中國少數採用開架閱覽方式的圖書館之一。[94]該圖書館設計藍圖由建築師德．希思（De Hees）集合眾議完成。建築坐南向北，爲平面布局略呈凸字形的二層大樓，水平的前樓中部爲入口，對稱的兩翼爲小閱覽室，內部各有兩張大桌。[95]垂直的後樓與前樓相接部份爲兩側帶有辦公用房的中廳，通過中廳，就可達後樓北端的半圓形大廳。根據圖書館的使用方式判斷，中廳當爲出納檯所在，而半圓形大廳當爲大閱覽室兼書庫。（附圖 5）這一平面與美國

90 龍永信，〈圖書館開架式流通制度研究〉，《文華圖書館學校季刊》，卷 3 期 4（1931 年 12 月），頁 455-466。

91 Charles C. Soule, “Modern Library Buildings,” *Architectural Review*, IX:1, (Jan. 1902), pp. 1-7.

92 如杜定友就曾說：「市民之不道德行爲，不知愛護公物，實足以摧殘圖書館事業……今日我國社會公民之道德衰微，即學校之學生，亦每每有竊取或毀壞圖書之病」。見杜定友，《圖書館與市民教育》，頁 19。

93 裘開明，〈韋師棣華女士傳略〉，《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6 期 6，頁 7-9。

94 裘開明，〈韋師棣華女士傳略〉，《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6 期 6，頁 7-9。

95 參見彭敏惠、張迪、黃力，〈文華公書林建築考〉，《圖書情報知識》，期 131（2009 年 9 月），頁 123-127；趙冰、劉衛兵，〈公書林興衰〉，何鏡堂、郭衛宏主編，《多元校園．綠色校園．人文校園：第六屆海峽兩岸大學的校園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

紐約布魯克林區公共圖書館太平洋分館（Brooklyn Public Library, the Pacific Branch，1903）——一所卡內基圖書館——的平面非常相似。（附圖 6）韋氏 1906 年至 1908 年期間曾在布魯克林區的普拉特學院（Pratt Institute）進修圖書館學，[96]對這座距學校僅 3 公里的新建公共圖書館當有所了解。而相似的平面還見於美國匹茲堡卡內基圖書館勞倫斯維爾分館（1899-1900）、聖路易公共圖書館卡班分館（St. Louis Public Library, Cabanne Branch, 1907）等許多圖書館建築。

凡·斯萊克在介紹勞倫斯維爾分館時說：「受書籍具有移風易俗的力量這一信念的趨使，〔卡內基圖書館〕所有匹茲堡分館都採取了開架制。但是，卡內基對於工人階層讀者懷有矛盾心理，這又導致了控制讀者與書籍交流的種種建築手段的利用。作爲第一座匹茲堡分館，勞倫斯維爾分館就展示了多種這些手段。開架使得讀者獲得了取閱他們需要的書籍的自由，但是扇形的書架布置意味著位於出納檯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可以監控這一自由」。[97]文華公書林半圓形平面的中心大廳或許也是韋棣華矛盾心理的流露，以及其在藏書與用書兩方面所作的折衷。

同樣因爲不便於館員監督閱覽空間，「凹室制」開架閱覽方式雖然在西方傳統的圖書館、特別是教會圖書館中曾經存在，但在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公共圖書館設計中已遭到圖書館員們的普遍反對，[98]在中國更鮮見實例。[99]此外，一般圖書館閱覽室中普遍布置大桌，使得讀者必須相向而坐，這也有助於互相監督。只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男女之防尚嚴，這樣的空間難免會影響女性對圖書館的使用。[100]

---

96 Jing Liao, “Chinese-American Alliances: America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brary System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25:1 (Mar. 2009), pp. 20-32.

97 Abigail A. Van Slyck, *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 American Culture 1890-1920*, pp. 106-107.

98 Abigail A. Van Slyck, *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 American Culture 1890-1920*, p. 6.

99 1929 年 10 月田洪都在〈對於圖書館建築應注意之數點〉一文中對圖書館內部之配置特別說明：「〔閱覽室〕尤忌有牆壁書架之中隔，俾便於監視」。見《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5 期 1、2 合刊（1929 年 10 月），頁 4-5。

100 爲方便女性讀者看書，一些圖書館另闢婦女閱覽室。見李小緣，〈圖書館建築〉，《圖書館學

文華公書林的正立面中部以希臘神廟造型門廊作爲入口，帶有四根高大的愛奧尼柱式的圓柱，兩翼窗戶圍以帶有三角山花的新古典式飾框。這種以古典建築風格爲基礎的設計在當時美國城市公共建築，特別是圖書館設計中頗爲常見。[101]凡·斯萊克認爲，古典風格反映了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之後法國學院派的影響，而後者就視古典要素爲公共建築的特質或性格（caractère）。除此之外。凡·斯萊克還認爲，風格趨同體現圖書館設計專業化所導致設計原則的定型化，是「市場力量」使然。[102]

由於缺少卡內基那樣的主導性個體贊助人，建築市場也不發達，再加上資金和地段條件的差別，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新建圖書館的標準各異，造型也多有不同。但因受到西方學院派建築，特別是圖書館建築主流風格，以及「中國古典」復興潮流的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早期新建圖書館中，採用西方古典建築或中國傳統建築造型要素的設計相對較多。不過，標誌著圖書館作爲一種新建築類型的獨立還在於其類型特徵。有別於傳統藏書樓，這一類型特徵就是以出納檯爲中心聯絡閱覽室和書庫的功能布局。

1928 年李小緣在〈圖書館建築〉一文中曾列舉各種圖書館建築的布局，其中有方形、長方形、三葉形（按：原文中此處另加有示意符號，形如光字上部）、丁字形、ㄇ字形、田字形、日字形、凸字形、凹字形等。其認爲：「長方形最普通，凸〔按：意當指倒丁字形〕凹形次之，丁字形又次之，口字、日字、田字形多爲極大圖書館所採用，以其光線較佳故也」。[103]在新建的圖書館中，滬江大學圖書館爲長方形二層西屋，復旦大學圖書館爲工字形二層西屋，大夏大學圖書館爲ㄇ字形二層西屋。[104]

季刊》，卷 2 期 3（1928 年 6 月），頁 385-400。但李認爲：「余意破除一切成見，男女可同在一閱覽室內讀書。不必另生枝節，另議婦女閱書處，徒多耗費，無補於事」。

101 如 1902 年美國的《建築評論》（*Architectural Review*）雜誌綜合介紹了 67 座設計優秀的現代圖書館，其中 57 座均採用了古典風格的造型或細部。

102 Abigail A. Van Slyck, *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 American Culture 1890-1920*, pp. xxv-xxvi, 44-63.

103 李小緣，〈圖書館建築〉，《圖書館學季刊》，卷 2 期 3，頁 385-400。

104 胡道靜，〈上海圖書館史〉，《上海通志館期刊》，年 2 期 4（1935 年 3 月），頁 1355-1477。

事實上採用了凸字形平面的圖書館更多。這一布局在 1880 年代美國著名謝普利·魯坦和柯立芝（Shepley, Rutan and Coolidge）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了賴亞森公共圖書館（The Reyerson Public Libra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04）之後就變得非常普及。[105]它以出納檯爲中樞聯絡閱覽室和書庫，而將書庫與閱覽室分離，不僅更有利於書籍的管理和保護，而且還可以根據書庫與閱覽室不同的空間高度和開窗方式分別設計。這從功能上和結構上講都很合理，尤其適合中小型的圖書館。文華公書林就採用凸字形平面，它使建築各翼都能三面開窗，保證室內光線充足，同時閱覽室空間在建築的外觀上也得到充分展現。

二十世紀早期採用凸字形平面，與文華公書林在風格上相似或相近的中國圖書館還有清華學校圖書館（美商茂旦洋行／Murphy & Danna, Architects, 1916-1919）、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上海允元實業公司建築部／Lam, Glines & Co., Inc.,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Jousseaume Pascal, Architect, 1922-1924）[106]（附圖 7）、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基泰工程司，1927-1928）（附圖 8）、上海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永甯建築師事務所，1930），以及江西省立圖書館（建築師待考，1930）等。不同的是，這些圖書館均爲閉架制，它們以凸字形平面的水平翼爲閱覽室，而以垂直翼爲書庫。1932 年 9 月落成的浙江省立圖書館（上海陸順記營造廠承造）目前平面布局不詳，但根據歷史照片可知其立面高達兩層的巨柱也爲西洋古典風格。[107]此外，雖然風格不同，武昌湖北省立圖書館（繆恩釗，1934-1935）、上海暨南大學洪年圖書館（范文照，1926-1927）、山西太谷銘賢學校圖書館（基泰工程司，1935-1936）、上海市立圖書館（董大酉，1935）、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基泰工程司，1936-1937）等建築也都採用了凸字形平面。[108]

---

105 Abigail A. Van Slyck, *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 American Culture 1890-1920*, p. 30.

106 〈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開放〉，《申報》，1924 年 3 月 21 日，第 10 版。

107 〈今日開幕之浙省立圖書館〉，《時事新報》，1932 年 9 月 15 日，第 3 張第 3 版。

108 參見袁同禮、陸華深等著《中國各省市公私圖書館概況》（香港：中山圖書公司，1972）各圖書館介紹。

然而以功能的合理性服務於讀者，並非圖書館設計者們對此公民空間的唯一理解。廣州中山圖書館（林克明，1929-1933）和武昌武漢大學圖書館〔開爾斯（Francis Henry Kales），1933-1935〕代表了以閱覽室為平面構圖中心的設計思路。

中山圖書館是陳濟棠主政廣東地區時，為促進地方事業發展所實施的建設項目之一。其平面呈田字形，其中閱覽大廳平面為八角形，大廳在四個方向上與正方形圍合的辦公樓和書庫相連。（附圖 9）這一平面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相倣。[109]武漢大學圖書館可容 240 位讀者的大閱覽室同樣為八角形，它的空間高達三層，東西側的走廊開大側窗，南北有高窗，為室內提供採光和通風。大閱覽室前部隔走廊與兩層高的入口和辦公樓相連，後部通過出納檯與角部兩座各七層高的書庫相接，樓上有 60 個座位的雜誌閱覽室。[110]大閱覽室與雜誌閱覽室共同構成體積高大的建築核心，在立面外觀上非常突出顯著。建築師開爾斯 1903 至 1907 年間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111]其以閱覽室為中心的設計或許受到母校標誌性建築——以高大穹窿頂中廳為大閱覽室的巴克工程圖書館——啓發。而建成於 1895 年的美國另一座著名的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婁氏圖書館（Low Memorial Library, 1895）——是更早採用穹窿中廳式閱覽室的實例。二者或許都參考了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或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所不同的是，這些歐美樣板是以穹窿（Dome）為閱覽室光線來源，外觀為新古典風格，而中山圖書館和武漢大學圖書館卻是覆以天花板，或在大閱覽室之上再設報刊閱覽室，因而閱覽室採光僅靠側窗而非中式的亭閣。此外它們在外觀上都採用了中式風格，明顯見諸綠色琉璃瓦的屋頂，帶有斗拱的屋檐以及一些裝飾細部。武漢大學是國民政府大學院（後改教育部）興建的第一所國立大學，而廣州中山圖書館的興建正值民國歷史上的

109 賴德霖，〈城市的功能改造、格局改造、空間意義改造及「城市意志」的表現——20 世紀初期廣州城市和建築的發展〉，收入賴德霖，《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頁 382-383。

110 國立武漢大學編，《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概況》（武昌：國立武漢大學，出版時間不詳）。

111 感謝斯洛安．考普爾（Sloan Kulper）和洪再新教授惠贈開爾斯的學籍材料。

「寧粵分裂」。兩座圖書館的中國風格，反映出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建設中建築贊助人的民族意識和對文化正統性的追求。

六、保存國粹理念的代表——國立北平圖書館

毫無疑問，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都擔負了普及民眾教育的使命，各地公共圖書館也都爲地方事業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作爲中國首座現代化的國家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履行這兩項職責的同時，還在實際運作和建築設計上突顯保存國粹的理念。

早在戊戌變法期間，京師大學堂中設立藏書樓／圖書館就成爲變法主張的內容之一。1896 年清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其〈請推廣學校摺〉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京師大書樓」的建議，與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游歷共同列爲改革措施。[112]1898 年京師大學堂成立，同年清政府制定了《京師大學堂章程》，表示「京師大學堂爲各省表率，體制尤當崇閎。今設一大藏書樓，廣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瀏〕覽而廣天下風氣」。[113]但隨著變法的失敗，開辦京師圖書館的動議也不了了之。1907 年，張之洞以大學士掌學部，1909 年 7 月 25 日正式奏請設立京師圖書館。[114]這一提案得旨俞允，開辦京師圖書館並附古物保存會的計畫，遂被納入學部在 1909 年上奏的〈分年籌備事宜摺〉中，[115]並於次年實現。[116]

---

112 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摺〉，光緒二十二年（1896）五月初二日，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95-99。

113 〈京師大學堂章程（節錄）〉，光緒二十四年（1898），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06。

114 〈張之洞籌建京師圖書館紀事〉、〈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摺〉，宣統元年（1909）八月初五日，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32-134。

115 〈學部奏分年籌備事宜摺〉，宣統元年（1909）三月三十日，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 125-128。

116 〈1909 年 7 月 25 日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摺及附奏三件〉、〈1910 年 6 月 1 日呈學部從 1910 年 6 月 1 日起啓用關防〉，收入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上冊，頁 1-8、9；張秀民，〈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址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 10 號 4（1936 年 7-8 月），頁 3-5。

京師圖書館最初的館舍利用北京城內什剎海後海廣化寺建築，爲的是「近水遠市，方無意外之虞」。[117]可以看出，這一選址依然延續了古代藏書樓的傳統。[118]究其原因，或許就是從羅振玉提出〈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和學部頒行《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所堅持的「保存國粹」宗旨。

從1909年至1925年，京師圖書館一直處於草創階段：雖然藏書量不斷增加，規則也不斷改進，但館址一直處在變更之中，館舍也一直因陋就簡，而且缺少現代圖書館學的專門人才。不過歷任館長或委員會人選都出自著名學者，如繆荃孫、江瀚、夏曾佑、錢稻孫、梁啓超以及陳垣和馬衡等，顯示出士紳／知識分子階層對於國家這項重要文化事業的參與和影響。而其最初制定「保存國粹、造就通才」的宗旨也沒有改變。

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現代化——包括引入現代圖書館學人才和建設現代化館舍——歸因於1925年教育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合作。1924年在美國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教育家及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學院院長孟祿（Paul Monroe）和韋棣華等人推動下，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批准國會第二次退還總計 1,254.5 萬美元的庚子賠款，以永久性的推動中國文化事業的決議。同年秋成立負責管理這一款項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119]1925年董事會第一次年會的決議包括：「（1）發展科學知識，及此項知識適於中國情形之應用，其道在增進技術教育，科學之研究、試驗、與表證，及科學教學法之訓練；（2）促進有永久性質之文化事業，如圖書館之類」。因教育部所屬京師圖書館「藏書甚富，徒以地址偏僻，館舍湫敝，於保庋閱覽，兩均未臻妥善」，所以中基會乃向教育部提議，由雙方合組一規模宏大、地址適中之新館。[120]10 月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組

117 〈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摺〉，宣統元年（1909）八月初五日，收入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頁132-134。

118 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修訂本）》，頁312。

119 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2-6。

120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介〉，《教育大辭書》，頁110-113，收入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下冊，頁1276-1278。

成，聘梁啓超、李四光分任正、副館長，後又加聘畢業於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的圖書館專家袁同禮（1895-1965）爲圖書部主任。雙方還共同擇定了北海西南牆外、御馬圈空地與養蜂夾道迤西之公府操場作爲新館的地址。[121]

1925 年梁啓超曾在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成立大會上講演，表達自己對於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方向的看法。與許多圖書館學家急於在中國普及圖書館的態度不同，他說：

> 我們絕對的承認群眾圖書館對於現代文化關係之重大……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是否應從擴充群眾圖書館下手，我以為很是一個問題……中國今日圖書館事業該向那條路發展呢？我毫不猶豫的提出答案道：一、就讀者方面，只是供給少數對於學術有研究興味的人的利用。縱使有人罵他是『貴族式』，但在過渡時代，不能不以此自甘。二、就讀物方面，當然是收羅外國文的專門名著和中國古籍。明知很少人能讀，更少人喜讀，但我們希望因此能產生出多數人能讀喜讀的適宜讀物出來。[122]

梁的觀點顯然有悖於當時圖書館運動向全社會普及公共圖書館的主張。[123]不過，在中國爲公眾服務的省市圖書館、學校圖書館乃至通俗圖書館已經引起圖書館界的高度重視而正方興未艾之時，梁強調爲新文化生產服務的研究性圖書館之重要性也非顢頇守舊。身爲館長，他菁英主義的思想必定得到了圖書館委員會的認同，也無疑會影響到這座國立圖書館的辦館方針。

受政局影響，中基會與教育部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的計畫受到挫折。1926 年 2 月，中基會致函教育部暫緩履行合作契約。同月又決定獨立組設建

121 〈國立北平圖書館建築委員會報告〉（1933 年 1 月），收入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下冊，頁 1222-1233。

122 梁啓超，〈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1 期 1（1925 年 6 月），頁 11-15。

123 所以李小緣提出的〈中國圖書館革命標語〉中還包括「打倒貴族式的圖書館，建設民眾的流通圖書館」當不無所指。見李小緣，〈全國圖書館計劃書〉，《圖書館學季刊》，卷 2 期 2（1928 年 3 月），頁 209-234。

築委員會，由該會董事周詒春、地質學家李四光，圖書館學家、清華學校圖書館館長戴志騫、中華圖書館協會書記袁同禮及正在代表羅氏中華醫社負責北京協和醫學院工程的建築師安那（Conrad W. Anner）5 人組成。購地測繪之後，委員會委託北京長老會建築師丁恩（Sam M. Dean）擬繪設計草圖。丁恩提出中國式和希臘式圖樣各一。委員會審議，「以合於四周之建築俾能觀瞻整齊」，決定採用「宮殿式」。同年 7 月，委員會又聘安那爲名譽顧問，參酌美國建築學會前例，擬定《北京圖書館徵選建築圖案條例》，11 月 15 日邀請 11 位中國建築師和 10 位歐美建築師參加設計競賽。1927 年 8 月 24 日競賽結果揭曉，丹麥工程師莫律蘭（V. Leth-Moller）的方案獲得首獎（附圖 10），按條例受聘爲建築工程師；1929 年 3 月動工興建。[124]

新館建築設計清楚地反映出建築師對圖書館空間「藏書的地位」、「閱者的地位」和「辦事人／館員的地位」三種基本要素的周到考慮。該建築平面左右對稱呈工字形，是前述凸字形布局的變體。基本格局是讀者活動區在前，工作人員活動區在中，書庫在後。沿建築中軸南線端進館，前樓一層是門廳和衣帽間。廳北爲東西向的走廊，向右和左通達位於主樓東西兩翼的善本閱覽室、四庫閱覽室、梁任公（啓超）紀念室，以及金石部和輿圖部各閱覽室。走廊南側、門廳左右，分別爲館長及文書室和會議室。走廊北側，與南側相對則分別爲中廳及其左右對稱設置的圖書陳列室和雜誌閱覽室。中廳以北即工字形平面建築的中部。其南端爲大樓梯間，向北通編目室，向上通二樓過廳，過廳南側即爲位於前樓二樓的大閱覽室，可容 200 人。過廳北側爲目錄室及圖書收發櫃。櫃內另有運書機與書庫相連。目錄室之後，爲閱覽組及參考組辦公室及研究室 4 間。建築的後樓爲 4 層高的書庫，可容書約四十萬冊。書庫地下室爲採訪部辦公室、食堂、廚房及通風機器室。此外還有總務部各辦公室、新聞閱覽室、四庫室、善本書庫、寫經室、模型室、輿圖庫、期刊

124 〈1930 年 10 月國立北平圖書館第二館概略（文稿）（檔概況 1.16）〉，〈北平圖書館建築委員會報告〉，收入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下冊，頁 1174-1199、1222-1233。

及報紙庋藏室等，均在前部和中部的地下室內。[125]（附圖 11）總之，新建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功能完備、設備先進。作爲中國第一所現代國家圖書館，它不僅將服務於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也將體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

關於建築風格，安那在其所擬的〈北京圖書館徵選建築圖案條例〉中規定「中國宮殿式」。他指出說：「所擬興築之基地鄰接於北海。北海在前清時代爲清室游憩之所，今已改爲公園。有最要之通衢經過其南。是以東、南兩面之建築尤須特別注意。正門應從南入，而東面實爲北海西岸風景中之一部……公園與故宮距離甚近，其大宮殿與四隅之角樓均可一覽無餘」。[126]作爲羅氏中華醫社建築部建築師，並曾負責過北平協和醫學院建築工程的實施，安那對建築所在地環境協調性的關心延續中華醫社在設計協和醫學院（Harry Hussey, C. W. Anner，1914-1927）建築時的考慮。[127]而這一考慮也符合京師圖書館最初「保存國粹」的宗旨。

建築師莫律蘭負責繪制全部詳圖。[128]作爲莫律蘭鋼與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工程顧問公司（V. Leth-Moller & Co., Consulting Engineers and Designer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and Steel Structure）的主持人，他最擅長的工作當爲結構工程；而即使如傅朝卿所說，實際負責設計的是丹麥藝術家尼爾摩（Erik Nyholm），[129]從整體到細部的設計，以一個結構設計公司的力量，獨力完成這座大型圖書館「中國宮殿式」建築當仍非易事。但建築師通過採用相對分散而非集合式的形體構圖，使得設計相對簡化。首先，工字形的平面將建築形體分爲前、中、後三個部份，建築師可以將建築富有表現力的閱覽室部份置

125 〈北京圖書館徵選建築圖案條例〉，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一年度報告（十五年三月至十六年六月）》（北京：北京圖書館，1927），頁 22-33。

126 〈北京圖書館徵選建築圖案條例〉，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一年度報告（十五年三月至十六年六月）》，頁 22-33。

127 馮晉，〈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設計與建造歷史拾遺〉，收入張復合主編，《中國近代建築研究與保護（五）》（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頁 757-765。

128 〈1930 年 10 月國立北平圖書館第二館概略（文稿）（檔概況 1.16）〉，收入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下冊，頁 1174-1199。

129 傅朝卿，《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3），頁 120，註 10。

前，並以其遮擋表現力相對較弱的書庫——此前何士（Harry Hussey）設計的協和醫學院小教堂已經採用這一手法。其次，各個單體的平面均爲矩形，更適合中國建築風格的表達。第三，將閱覽室和展室分爲三個單體，可以減小建築的體量，更接近中國傳統殿閣的尺度。除此之外，建築群中的各個單體形體簡單，這樣就可以避免集合式形體上複雜的坡屋頂交接以及由此可能產生防水構造隱患。

國立北平圖書館建築的「中國宮殿式」細部包括廡殿式大屋頂、飛檐、斗拱、梁架、欄杆、琉璃瓦飾，以及門窗圖案，甚至包括屋頂的「推山」做法。目前完整的設計檔案尚未公開，建築師的設計參考尚待查考，不過他進行中國風格設計的條件卻不難得知。如北京官式建築的視覺形象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通過攝影爲世人所了解；民國成立後又有許多從前的禁地被收歸國有而對公眾開放，在京的外國建築師還可以就近參觀考察。德國建築史家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和瑞典美術史家喜龍仁（Osvald Sirén）分別在 1925 年和 1926 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建築》（Chinesische Architektur）和《北京皇城寫眞全圖》（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更有大量細部照片和許多測繪圖紙可以供建築師參考甚至抄用。而早先建成的同樣風格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和燕京大學（美商茂旦洋行／Murphy & Danna, Architects, 1919-1926）建築，還可能爲北平圖書館的施工提供富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和受過訓練的工人。[130] 此外，建築委員會還聘請前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啓鈐爲顧問。朱曾負責過北京多項城市建築工程，在政界和營造界人脈廣泛。由他在 1929 年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也協助北平圖書館彩畫圖案的審定和繪製。[131]在這樣的條件下，國

130 如丁恩曾總結他在中國從事建築師業務的經驗說：「對外國人來說，無論在華時間多長，總是有一些行會以及它們錯綜的關係與行規，令他們感到極爲複雜。而對中國人來說，他們對西方某一時期建築和生活的技術也感到陌生。所以每一項建築工程也同時是一個教育工程，每一位新工人都意味著人的再適應」。見 Sam Dean, “China, the Land Where Builders Get Insomni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7 (June 1926), pp. 2-8.

131 〈本社紀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卷 2 期 3（1931 年 11 月），頁 15；卷 3 期 1（1932 年 3 月），頁 187-188。

立北平圖書館建築的外觀，特別是面對廣場的前樓部份的形體和細部，能夠較當時其他一些著名中國風格建築——如其前的北京協和醫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建築以及稍後的武昌武漢大學圖書館、廣州中山圖書館等——更忠實地呈現清官式建築的特點便不足爲奇。

身爲結構工程師，莫律蘭在北平圖書館的設計中，還採用了此前其他中國風格設計的同行均少採用之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他不僅因此創造出一個面積寬大、並帶有外廊的閱覽室空間，而且還在室內外展現了中國建築的框架結構特點。不過與中國傳統建築不同的是，北平圖書館南樓結構網當心間的開間寬度與稍間相同，而僅爲次間的一半，爲了在立面上加寬當心間的寬度，建築師於是將其兩檐柱向兩側平移，由此造成柱廊開間不規則的變化而與一般傳統建築外觀有所區別。

國立北平圖書館最初所定的「保存國粹」宗旨在新館建成後得到繼續。圖書館原藏普通書籍中文、滿文、蒙文、西文、日文超過一百萬冊，宋金元明清刊本、寫本、舊抄本近三萬冊，文津閣《四庫全書》36,300 冊，魏晉唐人寫經八千六百餘卷，地圖綾絹鈔紙本六千餘幀、147 冊，金石拓本唐開成石經近二百卷，近代金石拓本三千三百餘種。新建築落成後又新增中、西、日文書籍近十萬冊，輿圖八千多幅，金石拓本近四千幅。寄存書六千餘種，三萬餘冊，另有藏文甘珠爾經全部樂譜六百餘件，版片五百餘塊，還有殷墟甲骨獸骨、秦漢瓦當、漢唐銅鼓銅鏡八百餘件。[132]儘管《四庫全書》和善本古籍的閱覽室被設置在圖書館正樓的側翼，在建築空間上顯示出傳統知識在現代社會的邊緣化，但它們所擁有的專門閱覽室，又表明它們受到特別的「供奉」而神聖化。它們是中國悠久文化歷史的證明，而它們歷經劫難、最終入藏這所國家圖書館，並被整理、修復、分類、編目的故事則見證中國自晚清以來國運衰敗，而又在民國時期得到復興的歷史。

132 湯用彬、彭一卣、陳聲聰編著，《舊都文物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頁 103。

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落成典禮於 1931 年 6 月 25 日舉行，二千餘位中外人士、各國駐華公使、國內外學術機關代表躬自參與。另有近八十所機構、社會團體以及個人或發頌詞、賀聯、函電，或贈送書籍、文物表達他們的祝賀。[133]眾人背景各異，政治立場也未必一致，但他們對這座公共圖書館的建成表達的喜悅卻頗為共同。在通往閱覽室的路上，參觀者和讀者首先需要經過由一對高大漢白玉石獅拱衛的大門。大門的造型與紫禁城養心門相倣，後者的照片已見諸喜龍仁的《北京皇城寫眞全圖》，而石獅則是 1860 年英法聯軍摧毀的御苑長春園中遺物。進門後的草坪（後改為廣場）上對稱聳立著一對漢白玉華表，它們同樣來自長春園。（附圖 12）與館中所有的文物一樣，石獅和華表這些舊王朝的歷史遺存都在中國這個屬於公眾的現代圖書館中獲得新生命。北平圖書館的南樓，也即讀者所達的區域，被稱為「文津廳」。這一命名令人想到著名的皇家藏書樓——文津閣，它象徵著新圖書館對於中國歷史上文化正統的承繼。而室內天花平闇圖案中篆書的「石渠千秋」四字，令人懷想到中國漢代的皇家藏書樓——石渠閣；也是所有戮力於保存國粹的人們對這所新國家圖書館的祝願。

這座全新的中國現代圖書館又是如何影響讀者的呢？「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外觀是十分華美的，它的內部更為精美」。作為一名老讀者，著名學者鄧雲鄉曾經生動地回憶當初國立北平圖書館帶給他的現代感受。他說：

> 大樓是兩層玻璃門，有轉門，進門之後，先是衣帽間，以供讀者存衣帽、書包等。衣帽間十分講究，都是進口柳安木的護牆板，一格格的掛衣帽的格子，銅號牌、銅衣鈎燦燦照眼……進門後，就是一個方形中央大廳、四根柱子，頂上是倣古天花板，一格格地都畫著團鶴……說也奇怪，當時最感興趣的是坐在大廳兩角的飲水處去飲水。那是自動沙濾水飲水池，一按開關水從中心小孔噴射出來，這是美國玩藝，

133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頁 1-16。

> 北京當時只有這裡有……大閱覽室為了保持安靜，連地板也是咖啡色橡皮磚鋪成，走起路來一點聲音也沒有，即使坐了很多人，那偌大的閱覽室也像沒有一個人一樣，那真是一個肅穆的讀書環境，那氣氛正是顯示了高度的文明。大閱覽室擺的都是笨重的柳安木大桌，面對面擺十張大圈椅。十分寬敞……在桌子邊上嵌有號碼銅牌，找好座位，去到借書處查號借書，單子填好，交給借書處，你不要管了，到這座位上等着。閱覽室送書檯的先生們，辦公桌邊有通書庫的電傳滾帶，會把你要借的書由後面大書庫送上來。[134]

鄧雲鄉的介紹向人們展示這所現代化圖書館華貴精美的設施、文明宜人的讀書環境，以及高效有序的管理。換言之，這所國家圖書館不僅是一個文化的看護所、知識的傳播地，而且還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展示場。

作爲中國最高層級的公共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對書報閱覽「概不收費」。[135]但要進入這座國家級的文化殿堂，讀者必須注重自己的衣著。鄧雲鄉還曾回憶說：「當年進入圖書館時，有不少規矩：穿中裝時，如果只穿短衫褲，不穿長衫，是不能進館的，因而即使是再窮的學生，一件舊的藍布大褂總要穿的。如穿西式襯衫，襯衫不繫在褲腰裡不能進館等等」。[136]同樣，在文津廳通往二樓的中央樓梯之下還設有衛生間，其中地磚、玻璃「一色都是美國貨，比北京飯店的還講究」，[137]它爲讀者在進入大閱覽室之前整理自己的儀容提供了方便。現代著名教育家、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要求學生「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紐必結」。[138]北平圖書館對讀者衣著的要求既是一個國家級文化機構對於自身文化品格的定位，也是圖書館管理者對於新時代國民風貌的規訓。

134 鄧雲鄉，〈國立圖書館〉，《鄧雲鄉集——文化古城舊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79-185。
135 〈1929 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普通閱覽室和善本閱覽室暫行規則〉，收入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下冊，頁 1043-1050。
136 鄧雲鄉，〈國立圖書館〉，《鄧雲鄉集——文化古城舊事》，頁 179-185。
137 鄧雲鄉，〈國立圖書館〉，《鄧雲鄉集——文化古城舊事》，頁 179-185。
138 梁吉生、張蘭普，《張伯苓畫傳》（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頁 44-45。

這項要求同時符合古德塞爾在定義「公民空間」時提出的標準之一——「講求規儀」。

結語：中國近代的「公民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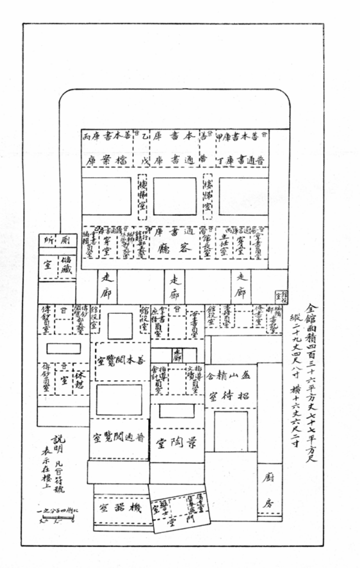
圖書館從來是士紳／知識分子的「學問之源」和「學問之庫」。[139]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它又成爲這些以「明道救世」爲己任的特殊社會階層據以改革社會的一個工具。其現代化歷史反映出作爲一個公民群體的士紳／知識分子階層的一種社會理想和現代化探求，亦即啓蒙社會、培養現代國民、保存國家文化和推進地方事業發展。

建築學所定義的公共建築通常是指爲公眾服務的建築。但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歷史顯示出這一公共建築類型另一方面的公共性，這就是廣泛的贊助人基礎——它以士紳／知識分子爲主，同時得到了各級政府、眾多社會團體甚至一些外國政府或組織的廣泛支持，因此在一個從帝制轉向共和的國度裡，它具有一種體現新時代特徵的公民性。

中國現代圖書館的歷史還表明，「公民空間」概念具有時間和空間的特殊性。在使用古德塞爾空間社會學的定義之際，我們有必要根據中國的社會和歷史情形對其進行補充或修正。在筆者看來，決定一種空間是否具有「公民」屬性的前提條件，是它與公民和公民社會的關係，而並非「國家所有」。私有空間也並非不可能成爲公民空間，只要它能夠服務於廣大的公民群體，體現一個公民社會的理想，並得到廣泛的公民支持。以此爲準，我們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圖書館建設熱潮，堪稱現代中國的一場公民建築運動；而各地建成的大小圖書館，就是現代中國公民建築類型的極佳代表。

139 杜定友，《圖書館與市民教育》，頁 6。

附圖 1　江南圖書館平面圖



資料來源：柳貽徵，《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南京：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8），無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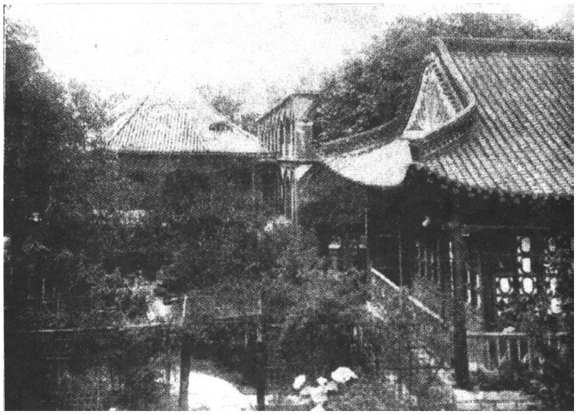
附圖 2　江南圖書館景陶堂

資料來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概況》（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1935），插圖6。

附圖 3　暇園（山東圖書館）玉佩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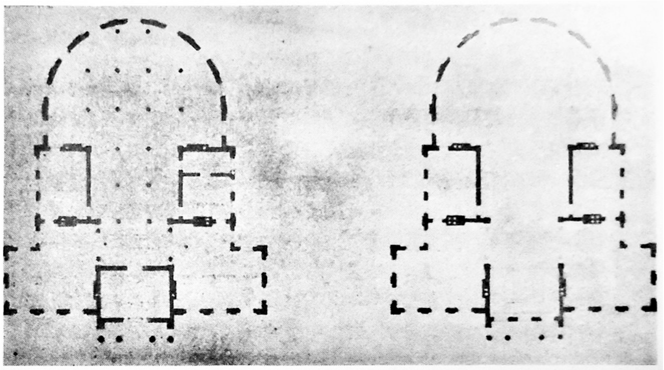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建築創作》雜誌社編，《百年建築——天人合一、館人合一》（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5），頁129。（感謝編者授權發表）

附圖 4　暇園（山東圖書館）虹月軒、宏雅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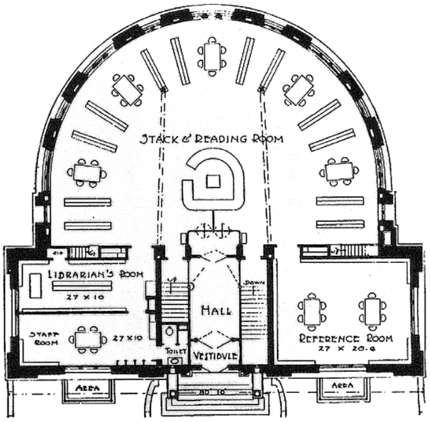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同附圖3，頁130。（感謝編者授權發表）

附圖 5　文華公書林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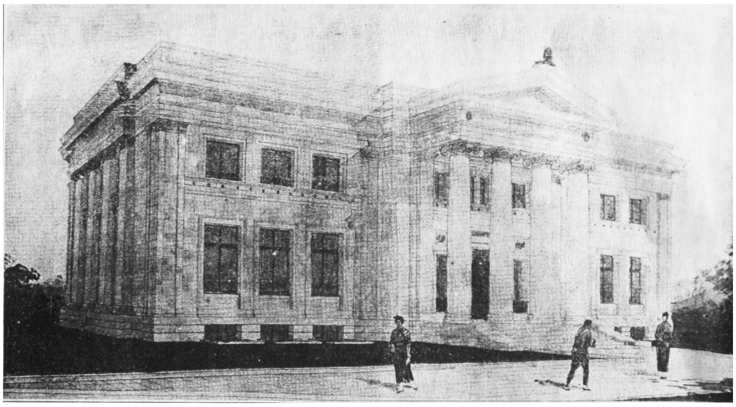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張安明、劉祖芬，《江漢縣華林——華中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17。（感謝出版社授權發表）

附圖 6　Raymond F. Almirall, Brooklyn Public Library, Pacific Branch, Brooklyn, c. 1907.



資料來源：*Brickbuilder* 16 (May 1907), in Abigail A. Van Slyck, *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 American Culture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Figure 3-47.

附圖 7　Lam, Glines & Co., Inc.,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Shanghai, The Library Building for the National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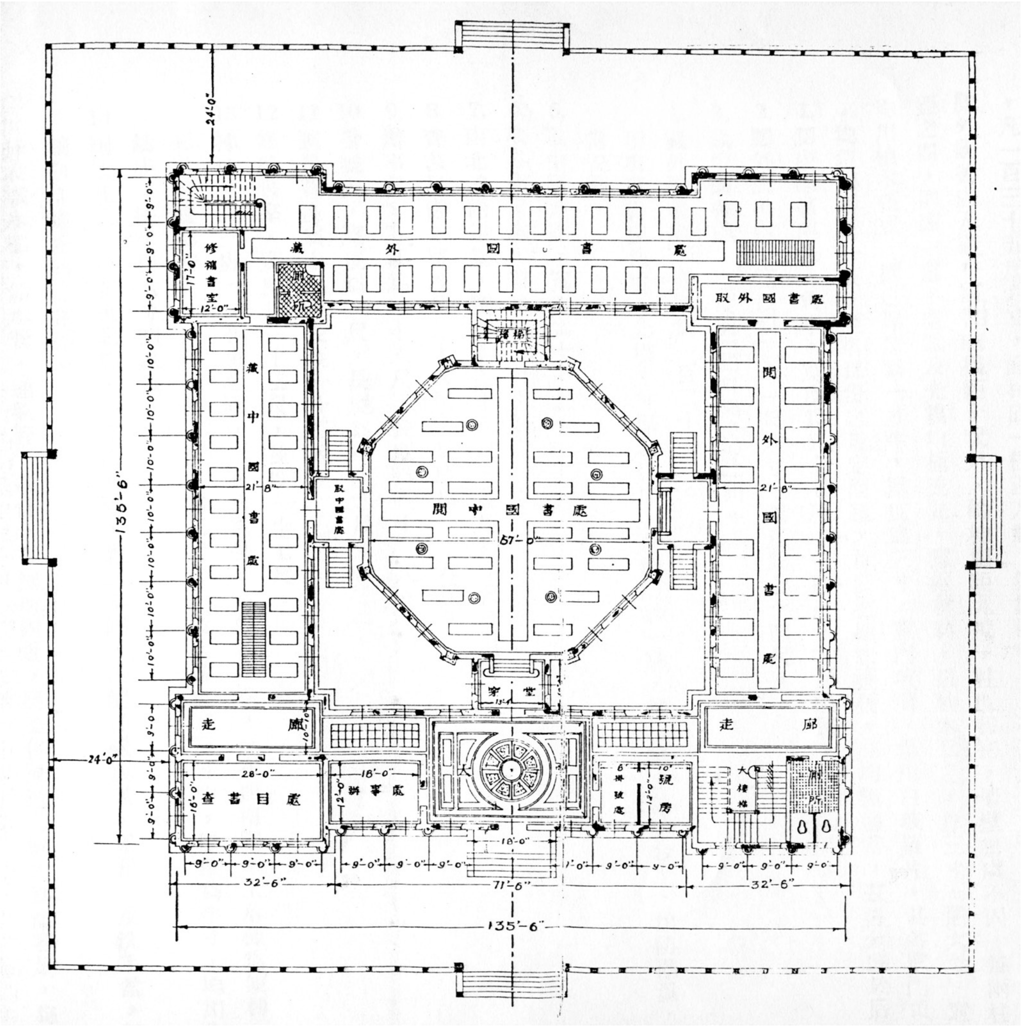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Library Building for National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Nanking,” *The Far Eastern Review*, vol. 18 (Dec. 1922), p. 784.

附圖 8　基泰工程司，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天津，1927-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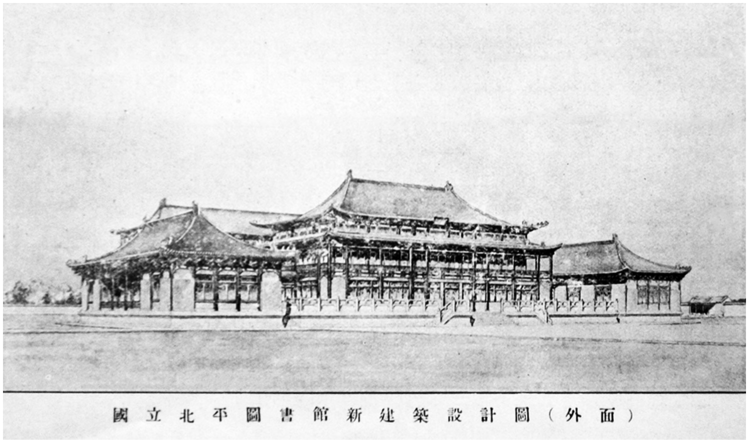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吳振清、李世銳，〈盧靖與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南開大學校史網，http://news.nankai.edu.cn/xs/system/2013/10/25/000148514.shtml。（2013年10月25日檢索）（感謝作者授權發表）

附圖 9　林克明，中山圖書館平面，廣州，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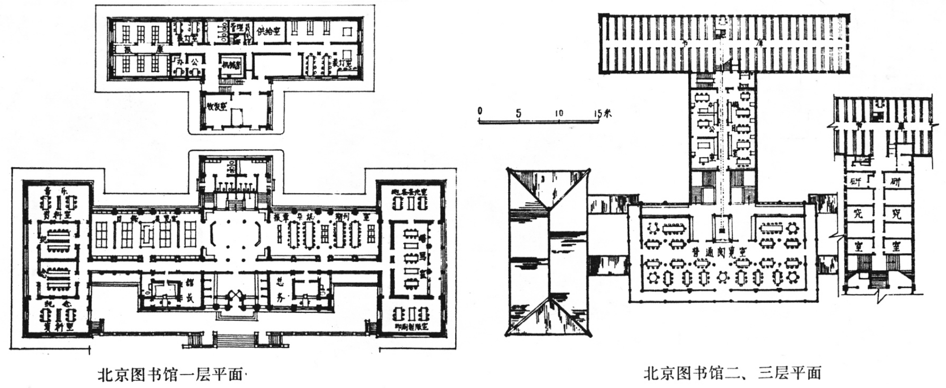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廣州市工務局編，《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特刊》（廣州：編者刊，1933年），無頁碼。
（感謝彭長歆博士惠贈此圖）

附圖 10　莫律蘭繪，國立北平圖書館新建築設計圖（外面），1927



資料來源：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二年度報告（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六月）》（北京：北京圖書館，1928）。

附圖 11　國立北平圖書館平面圖



資料來源：王紹周主編，《中國近代建築圖錄》（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頁110。（感謝王蕾女士授權發表）

附圖 12　莫律蘭設計，國立北平圖書館新館建築之外部攝影，北京，1931

資料來源：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大公報》，1906。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1、5、6（1925、1929、1931）。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卷 2、3（1931、1932）。
《申報》（上海），（1919-1923、1925-1926、1928、1929、1932）。
《東方雜誌》，卷 3、9、14、18、24（1906、1912、1917、1921、1927）。
《教育公報》，期 4（1916）。
《新民叢報》，號 1（1902）。
《圖書館學季刊》，卷 1-2（1926-1928）。
王紹周主編，《中國近代建築圖錄》，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中華圖書館協會編，《全國圖書館及民眾教育館調查表》，上海：中華圖書館協會，1935 。
中國史學會主編，翦伯贊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一年度報告（十五年三月至十六年六月）》，北京：北京圖書館，1927。
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1909-1949）》，上、下冊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概況》，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1935。
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宋　恕，《六字課齋卑議》，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杜汝儉等編，《中國著名建築師林克明》，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91。
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
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東方圖書館編，《東方圖書館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柳貽徵，《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南京：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8。
胡道靜，〈上海圖書館史〉，《上海通志館期刊》，年 2 期 4，1935 年 3 月，頁 1355-1477。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
袁同禮、陸華深等，《中國各省市公私圖書館概況》，香港：中山圖書公司，1972。
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許晚成編，《全國圖書館調查錄》，上海：龍文書店，1935。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北平：國立

北平圖書館，1931。
國立武漢大學編，《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概況》，武昌：國立武漢大學，出版時間不詳。
張秀民，〈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址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卷 10 號 4，1936 年 7-8 月，頁 3-5。
張怡祖編，《張季子（謇）九錄・政聞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湯用彬、彭一卣、陳聲聰編著，《舊都文物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裘開明，〈韋師棣華女士傳略〉，《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卷 6 期 6，1931 年 6 月，頁 7-9。
新民社輯，《清議報全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
端　方，《端忠敏公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

二、專書

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國圖書館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建築創作》雜誌社編，《百年建築——天人合一、館人合一》，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5。
杜定友，《圖書館與市民教育》，廣州：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1922。
杜定友，《圖書館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初版；2003 新版。
夏東元主編，《二十世紀上海大博覽》，上海：文匯出版社，1995。
梁吉生、張蘭普，《張伯苓畫傳》，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章開沅，《張謇傳》，北京：中華工商聯合會出版社，2000。
張安明、劉祖芬，《江漢縣華林——華中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傅朝卿，《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3。
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鄧雲鄉，《鄧雲鄉集——文化古城舊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劉國鈞，《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賴德霖，《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謝灼華主編，《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修訂本 2005。
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臺北：楓城出版社，1993。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Fairbank, John King,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Fei, Hsiao-tung. *China's Gentr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Goodsell, Charles T. *The Social Meaning of Civic Space: Studying Political Authority Through Architecture.*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McMenemy, David. *The Public Library*.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09.

Van Slyck, Abigail A. *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 American Culture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Weber, Max.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三、論文

左玉河，〈從藏書樓到圖書館：中國近代圖書館制度之建立〉，《史林》，2007 年第 4 期，頁 24-39。

李次巖，〈張之洞與廣雅書院〉，《羊城晚報》，2008 年 11 月 2 日，第 B2 版。

周　紅，〈教育救國思想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5 年第 5 期，頁 98-99、104。

姜　棟，〈清末憲政改革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從清末地方自治運動談起〉，《法學家》，2006 年第 1 期，頁 129-135。

倪怡中、陳銀龍，〈張謇與晚清民初公共圖書館的興起〉，《江海縱橫》，2013 年第 5 期，頁 44-47。

徐蘇斌，〈近代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史綱（1906-1936）〉，收入張復合主編，《中國近代建築研究與保護（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37。

馮　晉，〈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設計與建造歷史拾遺〉，收入張復合主編，《中國近代建築研究與保護（五）》（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頁 757-765。

彭敏惠、張迪、黃力，〈文華公書林建築考〉，《圖書情報知識》，期 131，2009 年 9 月，頁 123-127。

程　磊，〈羅振玉與京師圖書館的創建〉，《圖書館研究》，1983 年第 3 期，頁 47-49。

傅金柱，〈晚清地方督撫與近代圖書館館建設〉，《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3 年第 3 期，頁 77-78、87。

廖香錢，〈清末關於地方自治的一次大討論〉，《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7 年 8 月，頁 79-81。

蔣亞琳，〈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對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河南圖書館學刊》，卷 28 期 5（2008 年 10 月），頁 135-137。

薛玉琴、劉正偉，〈清末地方自治與近代義務教育的興起〉，《歷史教學》，2003 年第 1 期，頁 33-36。

Dean, Sam."China, the Land Where Builders Get Insomni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7 (June 1926), pp. 2-8.

Kwei, C. B., and M. S. "Chines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Oct. 10, 1928, pp. 77-78.

Liao, Jing. "Chinese-American Alliances: America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brary System in the 1920s and 1930s. "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25:1 (Mar. 2009), pp. 20-32.

"Library Building for National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Nanking." *The Far Eastern Review*, vol. 18 (Dec. 1922), p. 784.

Soule, Charles C. "Modern Library Buildings." *Architectural Review*, IX:1 (Jan. 1902), pp. 1-7.

Zheng, Jing, Chuan-You Deng, Shao-Min Cheng, Wen-Ya Liu, and A-Tao Wang.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Mary Elizabeth Wood." *Library Review*, 59:5 (2010), pp. 341-349.

四、網路資源

"Government Support for Free Public Libraries: The Founding of the San Diego Free Public Library." *The History of Books*, http://historyofbooks.wordpress.com/san-diego-the-exemplar-of-the-american-free-public-library-movement/the-american-free-public-library-movement-the-san-diego-free-public-library/government-support-for-free-public-libraries-the-founding-of-the-san-diego-free-public-library/。（2014 年 2 月 7 日檢索）

吳振清、李世銳，〈盧靖與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南開大學校史網，http://news.nankai.edu.cn/xs/system/2013/10/25/000148514.shtml。（2013 年 10 月 25 日檢索）

The Emergence of a Civic Architectur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Delin L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both library science and architcture to examine the design of the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in ligh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 First, I discuss how reformers who sought to disseminate new knowledge influenced th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modern libraries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Second, I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scholar-gentry on the spatial layout, and the reader-book relationship of a number of major public librarie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National Peking Library as a preserver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Libraries also embodie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cerns that reflected the interests of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as well as those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groups (including Westerners in China). Library construction thus won broad social support and diversified patronage that was unparalleled with any other building type in modern China. I conclude with a reexamination of the notion of "civic space," which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state-owned architecture as Charles T. Goodsell defines it.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National Peking Library, civic architecture, Charles T. Goodsell

*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